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11年2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6、浏览最新信息可登陆豆瓣“独立阅读”小组：<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孙骁骥、扬克、灵子

轮值编辑：灵子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贾葭（北京）、罗四鸽（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燕舞（北京）、灵子（北京）、吴强（北京）、言一（成都）

翻译：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编者按：

中东世界风起云涌，深深为这些国家的民众争取自由与权利的勇气而欣喜、祝福。
这段时间有点寒冷，冬天已去，春天迟迟不至，但春暖花开的日子终究会到来。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书评

刘 柠：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孙传钊：彼得·德鲁克的误记与栗本慎一郎的执著

凌 越：现代诗歌：燃烧的荆棘丛

戴新伟：书评教父如是说

访谈

灵 子：“归来的陌生人”：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许章润访谈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LITERATURE·FICTION 写作·虚构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youjinma@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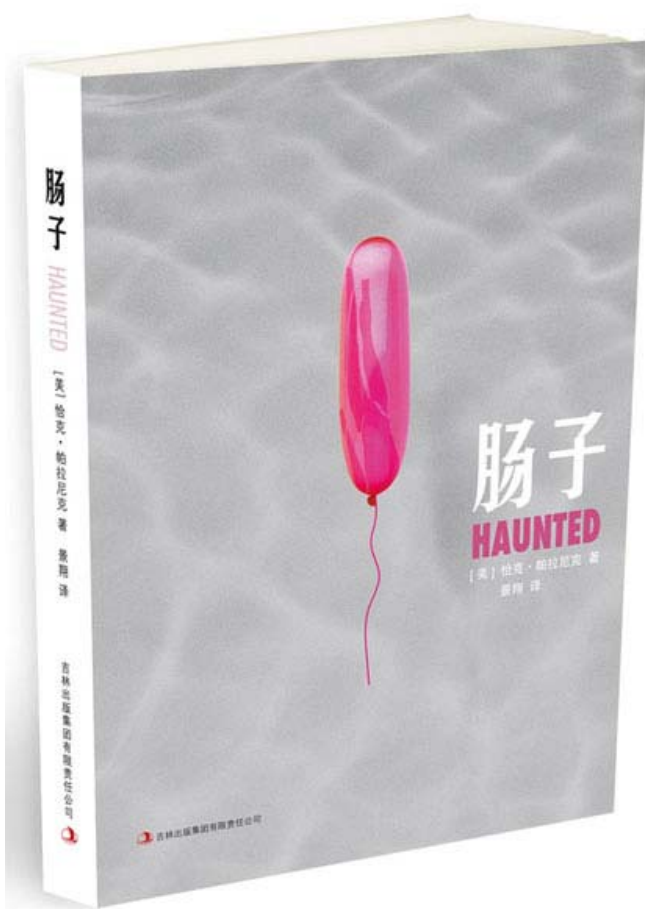
无需证实,当下就是一个我们不能不要面对的“文学弱时代”,这已是定论,面对最富有戏剧性和时代变迁的时代,现实里的一切已经穷尽我们作家的想象力,剩下的知识用恰当的方式去呈现,但现实是,我们的文学孱弱得就像新生的婴儿,一切都只能寄托在未来,而在当下还没有配得上这个时代的作品问世。

2011 刚刚开始不久,以我一向不负责任的态度地看来,年度过誉的作品已经有了。眼下的评论就跟我的不负责任一样,介绍和评价的不是商品的特点,而是一切都是为了“卖”。不知道头顶“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帽子的张大春本人是否觉得舒服,作为读者已经已经开始作呕。坦率地讲,《四喜忧国》(张大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城邦暴力团》(张大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都并非坏小说,反而是轻松阅读并能带来深度阅读快感的小小说,但鉴于一直以来不明真相的吹捧、心怀叵测的唱高调、暧昧不清的抬举太多了,跟期望比起来,它显然过于轻薄,跟自身达到的效果比,它的手段又显得过于复杂不实用。用金钱逻辑的话,我能理解出版商对此的厚脸皮摇旗呐喊,再哗众取宠都在我理解范围之内,但大批的有阅读习惯的文学青年跟着一同叫好,多少有点令人费解。《四喜忧国》以及《城邦暴力团》的题材吸引人,但内容品质判断起来并非难事,那种类似革命热血的口号实在是太有伤“文学青年”四个字了,那些看过仍为之叫好并忘乎所以滥用词汇的人,真是丢尽了本来已名声狼藉了的“文学青年”的脸啊。

美国的奥斯特是一位帅哥级的作家,跟其他大多数作家比起来,他可“卖”的内容显然多了一项。

《巨兽》(焦晓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不是奥斯特最好的作品,但仍值得一看。“巨兽”是政治寓言,城市、现代,在奥斯特那里都成了奇异而充满兽性的怪物。虽然我没少推荐奥斯特的作品,但一直觉得奥斯特是那种“鸡肋型”的作家,这当然可能被作家的粉丝痛骂,但即便抛开个人喜爱的局限,奥斯特的格局、故事以及故作技术高手的创作状态,都让人觉得多少有点提不起兴趣。奥斯特既有《纽约三部曲》(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这样老少通杀的作品,也有《密室中的旅行》(文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那种“失败之作”。其实这些也都不重要,好看才是真相。

《一部塞尔维亚电影》号称史上重中之重的“重口味”,这电影让我恶心了一阵。“重口味”、“恶趣味”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换句话说,作为文艺作品,他们早就存在,喜欢他们的人们也早就



存在，并非这个时代独有。很多人都在期待《肠子》（帕拉尼克著，景翔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的同时，很是担心——出的是完整版吗？毫无疑问，当然不可能是。《搏击俱乐部》（冯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原著作家帕拉尼克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网上备受追捧了，他的作品被网友自己翻译后曾经是很流行的“私密小说”。如今小说集《肠子》出版，当然不能放过最著名的这篇，以至于小说集无这篇尺度太大的小说但还是沿用这个名字。读者当然也不会太失望，看了纸版，你还可以根据书签提示顺便去看《肠子》的网络版，阅读当然不是问题。

在福克纳之后，据说掌管美国南方文学的就是奥康纳。作为一位女作家，奥康纳是看不出来多少女性气质的一位，她的作品阴郁，甚至黑暗，经常充满惊世骇俗的景象。这部《暴力夺取》（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仲召明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1月），奥康纳一如既往的硬朗和慢节奏，将家族、暴力、血腥、宗教、信仰等宏大话题小而化之，在她笔下没有刻意的渲染，但却有冷静直接的对细节无限放大。所谓人性的阴暗和那些阴暗背后不为人知的逻辑，奥康纳用女性特有的直接笔调一一再现给我们。

总的来说，春节至今的阅读生活并不如人意，兴奋点太少，光顾着给人挑毛病而冷落了阅读本身的快感。这就像边做爱心心里想着木子美老师的那些理论，对于那些奇技淫巧我们又总是不得要领。所以必须找一本书来让自己爽了一下了。《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J.M.库切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就是我一直存着等待这样的机会来看的书。库切从来不会让人失望，比上一本《异乡人的国度》好的是，这次库切与那些当代作家展开对话，他放弃了自己复杂而臃肿的身份，仅仅是一个读者，最多不过是研究者，他一针一线地将自己的阅读与那些同时代的作家穿在一起。平白直抒并不影响库切的真知灼见，比如他花了大篇幅介绍了保罗·策兰的生平，最后说：“策兰是二十世纪中期欧洲最卓越的诗人，他不是超越其时代——他并不想超越其时——而是充当其时代最可怕的放电的一根避雷针。他与德语难分难解的较劲，构成他所有后期诗歌的基础，在翻译中最好的时候也只是无意中听到而非直接听到。在这个意义上，其后期诗歌的翻译必然总是要失败的。”他的这些见解和困惑，大体上我都有过。

LITERATURE·NONFICTION 写作·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石家庄，zhm7976@126.com）

春节放假，正好读书。印象最深的是周有光的《拾贝集》（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年3月1版）。周先生是真正见证了三个时代的老人家，但脑子一点也不糊涂，甚至是清醒和深邃的让人惊叹；他是对国家和民族贡献颇多的学界名流，但谦虚、宁静和淡泊至极；他也并非只是言谈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文字领域，而是从语言文字领域而来谈论自己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认识；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在这本《拾贝集》中所收录的文章，除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杂文作品，都是极短的小文章，且不着文采，徐徐而谈，其他的近百篇短文都是他所摘抄的读书笔记，我随手翻阅，但却不得不正襟危坐了。我惊异的是他这些读书笔记的微言大义，更惊异他竟然在垂暮之年还能够如此的博览群书。他坦言自己是老人读书，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古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但读后才发现，要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真是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里有时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

不妨看看老人是如何恍然大悟的，我仅举一例。在《拾贝集》中，收录有他所编写的文章《蒋经国骂父信》，读完全文便不难发现整个文章都是抄录200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南生著作《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24页的内容，只是附录中有老先生这样的一句话：“这是蒋经国在苏联当‘人质’时期写

的信，后来他回重庆，到南京，去台湾，继承蒋介石政权，最后使台湾实行多党民主。”这篇文章收录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以史为鉴”中，几乎全都是他对于苏联历史研究的读书札记。另外两个部分分别是“清流拾贝”和“浊浪淘沙”，所记录的有他的见闻、杂感和记忆，更多的还是他从书籍、报刊和电视上读到以及看到的随笔和札记，但思维却是活跃的，眼光也是开阔的，思考更是深邃和厚重的。他戏称自己是“两头真”，在《百岁新稿》的自序中写到：“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也因此，我再读他的《拾贝集》，也还有沧桑与苦涩的滋味呢。

2月20日，北京。拜访完读书时的老师，我从魏公村坐公交车到中关村，准备去图书大厦买几本书。下车后步行，不远处的海淀教堂传来浑厚而嘹亮的钟声，我矗立街头，忽然有些百感交集。那天我在图书大厦买到了刘再复的散文集《师友纪事》（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1月1版）。刘再复的著作，近年来在大陆几乎是井喷式的出版，仅成规模的便有北京的三联书店、中信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刘再复作品系列”，其中重复出版的甚多，而三联书店的刘再复的《红楼四书》和《双典批判》还不算是重复。刘再复是八十年代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很具有传奇色彩，这些年浪迹海外，如今终于可以“归来”了。不过我比较纳闷他们这一批曾经叱咤风云有流落海外的知识分子，为何他竟然可以如此“归来”呢？而在这册《师友纪事》中，读到其中的《钱锺书先生纪事》，才找到了一点答案。在文章中他回忆钱锺书对于自己的影响，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人生处世上；后来刘再复流落海外，钱锺书十分关心他的人生处境，多次托亲友带话给刘再复，“在海外千万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政治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搞的。”也因此，刘再复说他在海外的近二十年，绝对不涉足政治。

刘再复，福建人，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文学评论》杂志的主编，还是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在学术界可谓是声名显赫的弄潮儿。在这册《师友纪事》中，除了这篇《钱锺书先生纪事》，还有几篇文章分量最重，依次是《周扬纪事》、《胡乔木纪事》、《胡绳纪事》、《施光南纪事》等。这些人物都是当代中国文化与学术领域权位极重的人物，而刘再复与他们之间的交往，几十年后在漂泊天涯时回首起来，真有些让人沧桑百感的滋味。他写周扬，这位在文革后转向为极力批判左倾的风云人物，刘再复曾数次代他立言，因此有机会走近这个内心极为复杂与焦灼的世界，也因此他曾有机会接近了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核心地带。真是幸亏，对于他这样性情纯粹的学者，面对这些惊涛骇浪中浮沉过的人物，也还都有书生的一面；也幸亏，他处于的还是那个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春天，面对各种扑面而来的问题，也还都有人性温暖的一面。

2月28日，我在本城火车站附近办事，想到附近有一家小书店，名为“文博书店”。十分朴素，甚至有些简陋，但所卖书籍很有品位，我猜测书店的主人一定是懂书之人。于是乘兴去找这家书店，但折返几



次，却没有发现书店的踪影，心里很是纳闷。后来终于在一个妇女的指引下，知道原来的书店已经改为文具店了。店主未换，但店里已改售文具、奶茶、糖果，只在里侧还放了两个书架，我看了看其中的书籍，大多已变成韩寒、郭敬明还有封面花哨的言情与财经类畅销书了。徘徊一阵子，终于选了一部荣宏君的《烟云俚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录》（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月1版），店主给打了八五折，花费了50元，估计是店内最贵的著作了。店主很高兴，我询问变故，她说只卖书维持不了生计，现在实体书店很难继续，连美国第二大的实体书店也已经倒闭了。

其实这样的经历，现在写来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不过，近来读了一篇关于《青岛日报》副刊编辑薛原先生的文章，便很感慨。那篇文章认为薛原“有病”，一是买书从来不买旧书，二是买书从来不买二刷的书，三是在书店买书从不让打折，都是原价购买；其病四是他编辑的书，从来都是精益求精到自己满意为止，但绝不允许出版社进行第二次印刷。其原因多少有些读书人的“洁癖”，但薛原的用意其实更明显，那就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那些还存在于自己身边的实体书店，否则他们可能很快就消失了；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那些小众的人文读物，否则他们很可能越来越难以出版了。薛原近些年来参与青岛“良友书房”系列丛书的策划，也连续编辑出版了《良友》和《闲话》两册“MOOK”丛书，皆信奉他的这些“有病”的书生信念。

而他近来出版的新著《闲话文人》（金城出版社，2011年1月1版），系他这些年用心读书的笔记心得，但显然也是他“有病”的结果，不但装帧做的精致，插图也很漂亮。内容我很感兴趣，主要以谈论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为主，诸如关于沈从文、老舍、萧乾、蒋兆和、石鲁、徐悲鸿、田家英、柯灵，等等现代文人，都能刨除寻常的庸见，而从史料中找到很多鲜为人知也十分独特的“另一面”，其中包括沈从文的天真到偏执、老舍的婚外情、蒋兆和抗战中的污点、萧乾的人性弱点等等，都写的温情又冷静；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有薛原的写作手法，不是常见的学术论文，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文学，而是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连缀而成的散文笔法，有点知堂的意味，但却平和有趣的很，十分适合闲来消遣的。



THOUGHT 思想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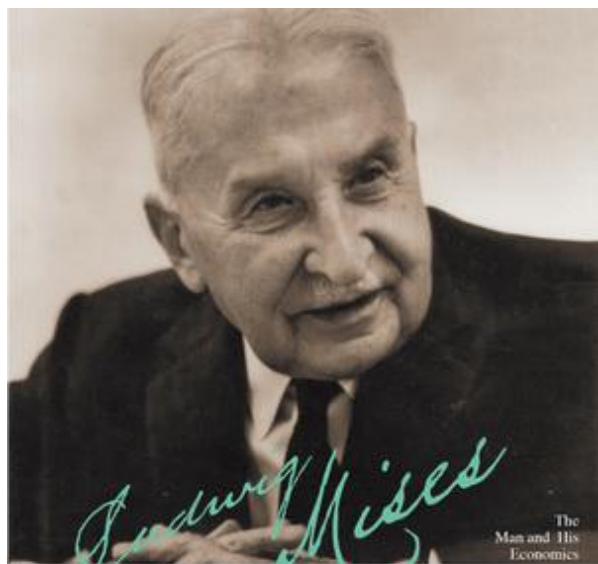
从去年底开始，阿拉伯世界爆发剧烈的政治震荡，让人目不暇接，如何理解阿拉伯世界的这股政治反对运动？单从政治思想的引介角度来看，国内的出版物无疑是极端缺乏的，笔者多次搜索，也未能发现一本足以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当今阿拉伯世界政治思想光谱的著作，只能找到某些零碎的政情介绍著作，如《伊斯兰激进组织》（涂龙德、周华著，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就集中介绍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

该组织也被认为在埃及这次反政府运动中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国内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思想光谱是陌生的，甚至可以称作一无所知，他们的政治形态、制度与政治演变史，国内的政治学界都缺乏深入的研究。

阿拉伯世界的这股政治变动潮流，无疑让西方与中国流行日久的一些政治思维模式产生剧烈的冲击，如埃及著名社会理论家萨米尔·阿明就指出，这次埃及社会运动的主力为四部分，分别是青年人、激进左派、资产阶级民主派与穆斯林兄弟会，在这四股力量中，各自的诉求与意识形态都存在明显的分歧，泛泛地以反资本主义与左翼抗争来理解，或许都会失准。

关于这次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动，媒体与一些学者都在猜测，这是否是全球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序幕，虽然这一看法仍有待细论，但毫无疑问，“民主”仍将是这一世纪的重要政治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约翰·邓恩的《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尹钦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无疑是必要的，用邓恩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是要解释为何民主这股诞生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潮会在消失近2000年后复兴，从而成为当今政治世界的一个重要选择。在中文译本出版之后，邓恩也颇耐人寻味地发信给中文出版方，称他“并不假装给任何地方的读者上什么课，但我十分希望它激发任何地方的读者独立思考。你也清楚知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急需这个了。”

久未介绍政治、社会思想领域的著作，本期也想重点做一点推介，如关于韦伯的翻译。韦伯一向被看作是古典社会学的大家，后世对其所进行的专业研究也来自各个不同学科，如社会学、哲学、比较宗教学乃至历史学，甚至许多非西方思想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常常会以韦伯的问题意识出发，来着手自己的研究，例如余英时对儒家思想史的研究。最近几年，大陆陆续有一些韦伯著作的新译本出现，或是大陆本土学者所译，或是直接从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引进的韦伯著作系列。有意思的是，国内一些学者仍然在韦伯著作的翻译上用功发力，例如阎克文新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与《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以一己之力重译韦伯这等大家，先不论翻译本身，阎克文先生能以自由学者身份投身这等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上，无论如何都值得赞赏。另外新译的一本韦伯的著作《论俄国的革命》（潘建雷、何雯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7月）则是韦伯这部著作的首度汉译。



Ludwig von Mises
The Man and His Economics
米塞斯评传
其人及其经济学
[美] 伊斯雷尔·M·柯兹纳 (ISRAEL M. KIRZNER) 著
朱海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般而言，经典重译大抵都是新人新译，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岳麓书社，2010年8月）却是旧译新出，译者顾寿观属于老一代前辈学者，论资历，他与吴冠中、王道乾、熊秉明是同期留法生，论才华，他在熊秉明眼里是当年留法生中最具哲学天赋的学者，但论命运，顾老一生多子，在政治运动中饱受批判，最终精神失常，文革后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翻译，但却早在1990年就告别人世。这本《理想国》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过来，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对于另外一位思想大家尼采而言，关于其著作的汉译也是学界的热点，除开近年来刘小枫组织的尼采全集译本，孙周兴先生却靠一己之力来翻译尼采全集，最近

连续推出了三本：《尼采著作全集（第4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商务印书馆，2010年8月）、《尼采著作全集（第12卷）：1885-1887年遗稿，〈权力意志〉上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6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887-1889年遗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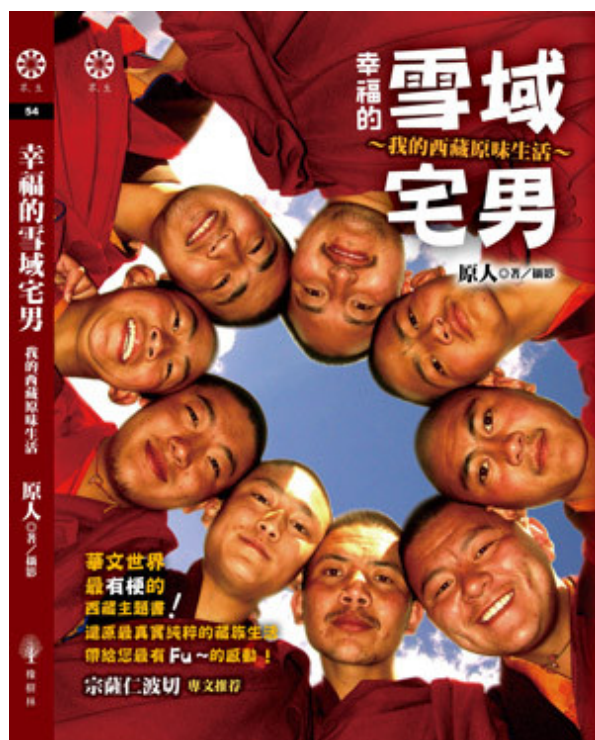
如果说尼采常常被理解为与右翼保守主义有密切的思想关联，那么另外一位自由派右翼思想家则常常被忽视，他就是哈耶克的精神导师——米塞斯。众所周知，哈耶克是苏格兰启蒙思想传统的嫡系传承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反对计划经济的思想却来自于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塞斯，而米塞斯的理论资源则部分是来自于康德。最近出版的柯兹纳的《米塞斯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朱海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1月）是一本系统介绍米塞斯经济思想的传记，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思想界仍然只将米塞斯定位在经济学家角色上，而对其经济学背后的哲学创见往往忽视，事实上，在当年的维也纳知识圈里，最有名的并非是大家共知的“维也纳小组”，而是米塞斯、弗里德荣等组成的各种讨论会与小组，而当时米塞斯所举行的讨论会，主题并不是经济学，而是关于“关于认识的认识”，可见米塞斯绝非是狭义的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沃格林曾在米塞斯的讨论会上表现十分活跃，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誉为维也纳少见的天才人物。

最后还是介绍两本略微轻松的游记吧，在前几期中，我曾推介过刑肃芝的《雪域求法记》（三联书店，2008年），不过过年期间才断断续续全部完，虽然走马观花式的阅读也相当愉悦，但凭借直觉，此书许多史料也应成为汉藏佛教交流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例如十四世达赖灵童的遴选过程以及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还有当时汉僧前往西藏学密的情况，如大名鼎鼎的梦参老和尚，当年就在拉萨因口才一流而被怀疑为匪特，惹来不小的麻烦。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史料可能由于作者记忆的问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确证的地方，如书中提到一位当时来色拉寺学习的汉僧，后与阿沛·阿旺晋美的女儿结婚，刑肃芝此处所指应为著名的因明学专家杨化群（永灯嘉措），但他与阿沛·阿旺晋美之间的关系应为儿女亲家，即阿旺晋美的大儿子阿沛晋源因在五七干校期间学习，结识了杨化群，并且后来成为其女婿。

去藏地学习佛法，如今也成为一种潮流，如原人的《幸福的雪域宅男：我的西藏原味生活》（台湾橡树林出版社，2010年8月）就是新生代前往藏地的年轻修行者，书中记录了作者在四川德格宗萨寺的学习经历，不仅描述了许多藏地佛教的细节，也描述了“新生代”学佛青年人在那里的一些饶有趣味的日常生活。例如笔者随便一翻，里面就有大量鲜活的日常照片，假如与刑肃芝的《雪域求法记》对看，后者的照片虽也丰富，却大多都为正襟危坐，一生动，一严肃，折射出的是不同代际学佛人的风格差异。

不过，关于汉地佛教的游记，其实如今也并不鲜见，但却少有人作有力推荐，如高鹤年的《名山游访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1月）就是民国著名的佛教道场游记。其文字近于徐霞客，但除却各名山大川的地理形态之描绘外，更多展现的是一幅汉传佛教地理画卷，无论是对于研究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均有推介的意义，而且，如能与新近出版的《禅的行囊》（比尔·波特著，叶南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10月）合读，则或许能多多少少窥得汉传佛教一脉的兴衰起伏与现状吧。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

当民众公开表达反对, 执政 23 年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只维持了 28 天, 执政 30 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只维持了 18 天。执政 42 年的利比亚“革命领袖”卡扎菲, 还能维持多少分钟, 举世瞩目。

这个时候, 很适合重读美国学者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 月), 虽然书中那些历史事件发生在二三十年前, 却很有现场感。两位美国学者指出, 非民主政体常常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 但是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非民主政体能够“稳定压倒一切”。根据他们的研究, “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 巴西在 1970 年代早期, 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在最后的 20 年中 (和韩国), 都拥有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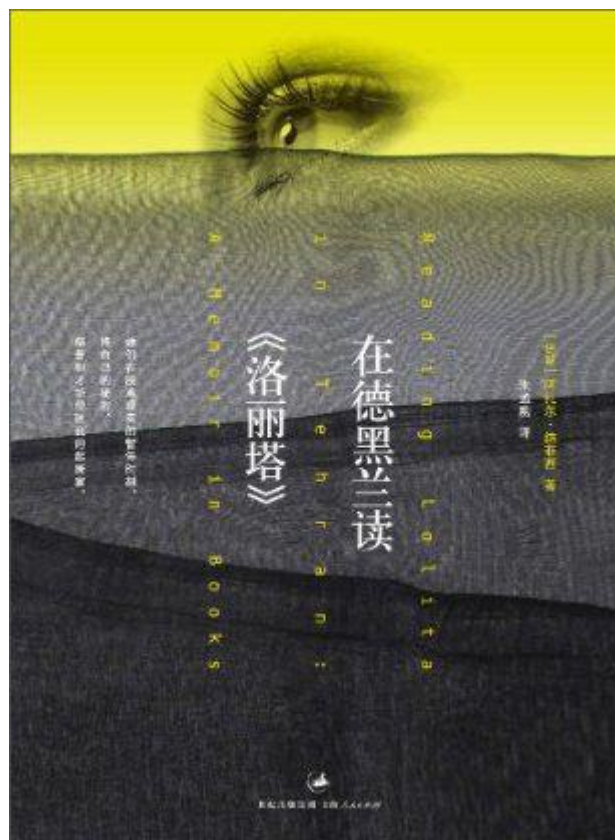
北非诸国有相似之处。2004 年, 本·阿里再次当选总统。《光明日报》(10 月 26 日) 刊发分析文章《本·阿里缘何高票当选连任》, 称“突尼斯政治稳定, 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经济发展最迅速, 社会最安全的非洲国家之一”。利比亚的经济形势同样“蒸蒸日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报告, 2010 年利比亚 GDP 增长率约为 10%。

“国泰”为何“民不安”? 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民众的授权, 而是来自经济增长, 这是危机的根源: 一旦经济停滞, 合法性立即丧失; 如果经济持续增长, 民众对个人权利的诉求会更加强烈。更何况, 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不是民众, 而是执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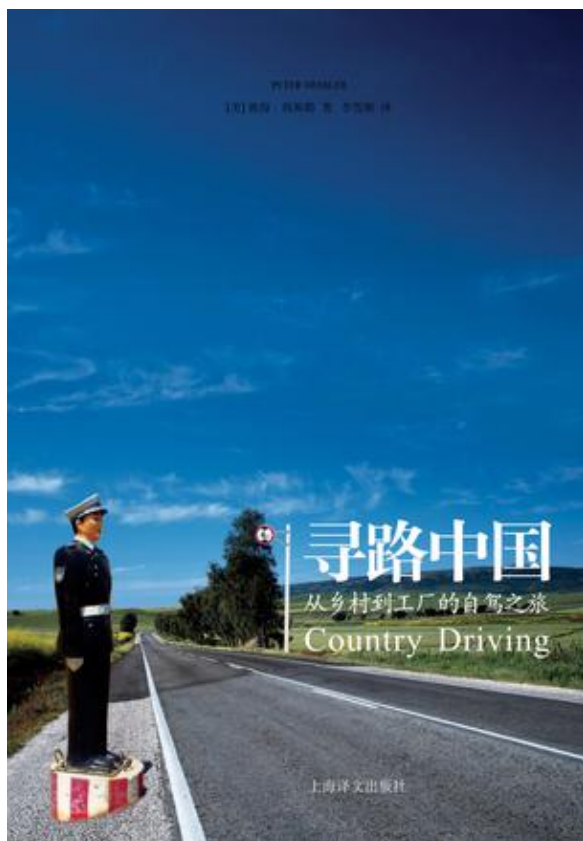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的记者借用突尼斯一位高官的话称赞本·阿里, “在政治体制问题上, 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 而是注重把政治民主进程与国情结合起来, 对政治改革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针”。不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 这是东方国家惯用的修辞, 欧洲位于突尼斯北部, 本·阿里和他的家臣们, 不盲目照搬的是北方的民主政治。可是, 不管西方还是北方, “循序渐进”了 23 年, 突尼斯民众已经不再相信这套说辞, 他们意识到这不过是拖延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代名词。

突尼斯的蝴蝶, 掀动了北非和西亚。伊朗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朱孟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 月) 里指出: “对抗专制并非一场政治之战, 而是一场生存之战。”读这本书的时候, 时常想起玛赞·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长大》(马爱农、左涛译, 三联书店, 2010 年 1 月), 以及那部同名动画。

纳菲西, 生于 1955 年, 13 岁去国离乡, 学成返回伊朗, 在大学执教被辞退, 再度赴美; 莎塔碧, 生于 1969 年, 14 岁去国离乡, 后来返回伊朗继续学业, 水土不服, 再度赴欧。两位女作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出身世家, 甚至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最重要的是, 她们对故国都是百感交集: 留在伊朗, 无法按照自己认同的价值生活; 离开伊朗, 却难以切断和故国的精神联系。纳菲西这样说: “我离开了伊朗, 但伊朗并未离开我。”



在离开大学但是尚未离开伊朗的两年时间里，纳菲西邀请几位学生，每周四到她家讨论文学。极权体制不仅剥夺了公民的政治权利，更伤害了公民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被取消意义，成为空虚、无聊、得过且过的代名词，混日子成为人生理想。公民不是享受日常生活，而是被日常生活伤害。纳菲西发起静悄悄的“生存之战”，发起一个微观的精神共同体，重新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感，也告诉处于同样情境下的读者，即使政治体制一时无法改变，通过个人对精神的坚持，依然有可能恢复日常生活的基本伦理。在中国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触类旁通。《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直接使用了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译本，该公司刚刚于2011年2月出版纳菲西的《我所缄默的事》，很期待这本书也能迅速引进大陆。



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是在二月份的一份惊喜。作者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他对中国的理解“远超时人”。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城墙”讲述他沿着古长城自驾游的经历，第二部“村庄”讲述他在长城脚下的村庄居住的经历，第三部“工厂”讲述他在浙江新兴工业城镇的经历。

《寻路中国》的风格介于游记和田野调查之间，兼有纪录片的视觉效果。从文体上看，与比尔·布莱森有相似之处，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戏谑。但是，比尔·布莱森的游记多是走马观花，海斯勒却是上山下乡。阅读海斯勒笔下“长城边的中国”，远比阅读《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曹锦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过瘾。大概十年前，学界争说《黄河边的中国》，我未能免俗，赶着时髦找来一读。或许是因为我在“淮河边的中国”居住了17年，虽然淮河和黄河有段距离，但是《黄河边的中国》对我而言没有太多新鲜之处。

曹锦清先生两入中原，历时四个月左右，写出60万字的观察与思考。《寻路中国》的第二部分大概是10万字左右，但是海斯勒在这个村庄居住了数年。时间的长短并非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黄河边的中国》与其说是出自学者视角，不如说是出自地方官员视角。在前言里，作者称：“此次调查所及的十数县，甘来个乡镇，数十行政村的无数官员，干部所给予我的信任与支持，实非‘感谢’一词所能表达我的感谢之情。”但是，他接着又称，借宿蹲点的农户与村民提供的材料，是调查主要内容。这种调查路径是典型的行政路线，他与一个村支书交流，需要出示乡政府的介绍信，“谨慎的老支书拿着乡里的介绍信认真观看后，才似乎弄清了‘我们’的来路，放下心来回答我们的提问。”这种行政路线的调查，是不是学术意义的田野调查，很可存疑。《黄河边的中国》呈现了基层官员眼中的乡村社会，可是很多学者把它直接等同于乡村社会，由此生发的观察和思考，在无形之中被基层官员支配。

在《寻路中国》里，海斯勒也曾与地方政府联系，调查世界银行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项目。政府提供了很多数字，与《黄河边的中国》详细记录基层官员提供的数字不同，海斯勒对此一笔带过，他表示：“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早在帝国时期，各级官僚们便会玩转数字。海斯勒详细记录了官员如何陪他就餐，如何劝酒。告别官员之后，他直接找到村民，得知村民并不支持这个项目，他们劳动的报酬是每天五袋方便面，而且是“清真方便面”，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回教徒，而是因为这种方便面最便宜。

海斯勒回到北京，告诉世界银行的官员，官员坚持认为是农民弄错了。

《寻路中国》属于海斯勒的“中国纪实三部曲”，另外两本是《消失中的江城：一位西方作家在长江古城探索中国》（吴美真译，台北：久周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和《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卢秋莹译，台北：久周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前者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版权，后者在短期之内可能只有台版可看。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花絮是，海斯勒的太太张彤禾——

《华尔街日报》前驻华记者——著有《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Spiegel & Grau, 2008)，同样值得期待。

只有深入细节，才能明白“大国崛起”不仅是一种荣耀，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2010年8月的“独立阅读”里，我曾谈到自己对“小国是怎样崛起的”很感兴趣。当时还不知道，台湾学者张亚中先生已经写过一本《小国崛起：转折点上的关键抉择》（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最近在季风书园偶遇，立即拿下。作者指出：“国家崛起的意义应当在于为自己的国民创造幸福，为世界带来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与大小无关。大国崛起，精英却八仙过海，纷纷向外移民，这种“大国崛起”有多少值得尊重的成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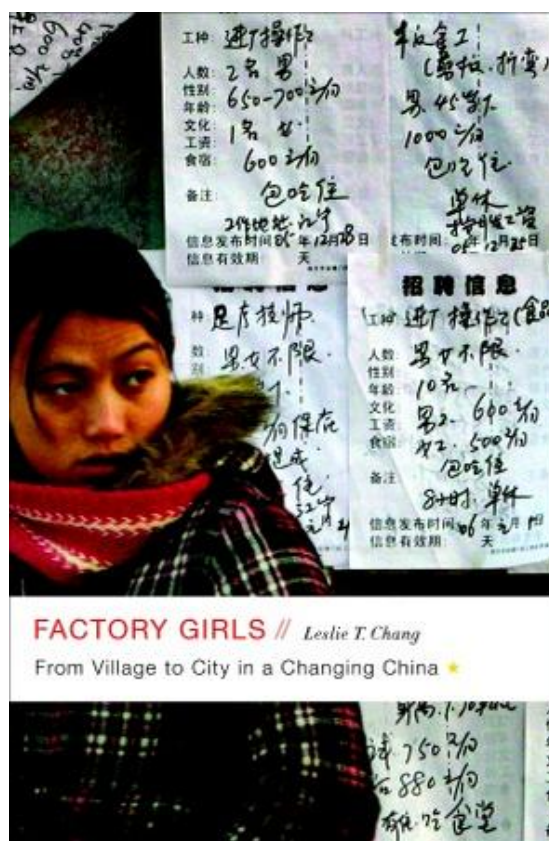
不仅国家崛起与大小无关，著述优劣也与篇幅无关。黄宗羲先生的《明夷待访录》，盈盈一握，中华书局1981年版只有47页，定价0.24元。或许因为篇幅有限，迟迟未能再版，我手边只有《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的版本。诸位如果尚未补进此书，可以考虑刚刚出版的《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2011年1月）译注本。

BOOKREVIEW 书评

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 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 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 1943年, 应征入伍, 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 日本战败, 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 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 复员, 回乡继续务农, 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 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 并由村上介绍, 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 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 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 因“白鸟事件”的关系, 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彼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 党内机关分公开部门和非公开部门。)1955年7月, 日共召开六中全会, 两派(国际派和所感派)统一, 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 应组织上要求, 离开日本, 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 晚7时30分许, 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 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 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 犯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 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 具有多重背景, 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 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 系从战前到战时设置于日本主要府县警察署中的政治警察组织。与接受县知事和警察部长指挥的普通治安警察不同, 特高警察受内务省直接管辖)活动, 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 负责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 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 被日共看成是“凶恶的敌人”。同时, 作为治安警察, 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 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 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 还曾去过一间叫做“紫浪”的酒吧, 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见《日本的黑雾》, [日]松本清张著, 文洁若译, 作家出版社, 1965年, 第128页。)

1949年至1950年, 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GHQ)的指示, 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Red Purge), 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 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 日共召开五中全会, 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 各地革命风起云涌, 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 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 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 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 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 一群非固定雇佣劳动者一边静坐, 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 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 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 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 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 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无论是美占领当局, 还是日本政府, 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 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 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 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 或出狱后离奇死亡; 超过三分之二(按原日共札幌地委成员、事发脱党后被捕、后又转向成为检方证人的迫平雍喜在其著作日本周报社版《白鸟事件》中的说法, 截至1959年, 在因事件而被捕的人中, 脱党者有36名, 未脱党者有19名)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 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 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 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 因而被迫流亡中国。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在位于埼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陆；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在北京曾接受过日本时事通信社的独家采访）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川口孝夫夫妇也是其中的两位。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去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被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在呆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不过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从烧津港（位于静冈县中部的小渔港）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见《蜀国漂流记》，[日]川口孝夫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见《日本共产党の戦後秘史》，[日]兵本达吉著，新潮文库，2005年，第231页。）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材料（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の黒霧》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一边“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1952年5月1日，美军事占领结束3天后的五一劳动节，由日共及亲日共的左翼青年团体组织的大规模无产者示威游行，在向目的地皇居广场行进的途中，与警察部队发生混战。事件造成警察方面重伤伤者750名；示威者方面死亡1名，重伤伤者200名；除此之外，还有11名外国人负伤。共有由1232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其中261名被以骚扰罪起诉，最终16人被判决有罪。该事件被称为“血腥的五一”事件。受事件的负面影响，在事发5个月后举行的众议院总选举中，日共一举失掉在众院中的全部席位。直到1970年，众院席位才恢复到与事件前相当的水平。——作者注）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见《蜀国漂流记》第2页）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

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见《蜀国漂流记》第5页）

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见《蜀国漂流记》第5页）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歌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见《蜀国漂流记》第13页）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歌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见《蜀国漂流记》第16页）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见《蜀国漂流记》第42页）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开展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自身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出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成都”。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见《蜀国漂流记》第63页）



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方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方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的、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见《蜀国漂流记》第79页）

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其次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

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但是，对于川口们的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联部态度比较暧昧，并未给予明确的支持，显然还是顾虑到与兄弟党的关系问题。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觉得可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的可能性。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8月初，再次来到北京，住在中联部招待所。但却不能随意走动，甚至无法看中联部的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升温。9月，好像是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据说得到了毛的批准。后来，由陈毅外长在怀仁堂在京外国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干部会议上做了传达，从此老外参加“文革”便具备了政治正确性。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毛还未出现，从长安街东侧进入广场准备接受检阅的红卫兵队伍就开始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边喊口号边缓慢向前挪动。周总理声嘶力竭地反复喊话：“同志们，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当毛出现在城楼上的一刻，已经走过中心线的队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周恩来拼死呼吁队伍前进，队伍才稍稍往前移动些许。川口被“民众对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压倒的同时，在观礼台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拥有的使民众如此狂热的神奇魔力”。（见《蜀国漂流记》第92页）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川口刚好与“铁人”王进喜同桌而坐。王给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朴素，从谈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王大约听出他的中文有点别扭，问他“是外国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正好陈永贵也步出会堂。几位日本贵宾觉得，“如果王进喜是中国工人的代表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象。“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见《蜀国漂流记》第93页）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当时，一行人被置于大权在握的中联部“造反总部”的管辖之下。为了视察活动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总部”后台老板康生的墨迹。据说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会受到热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贤的接见。张春桥致了欢迎辞后便匆匆离去，川口觉得他是个“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则花一天的时间为一行人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姚的报告非常详实，充满激情。但每一句话都要通过译员翻译成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影响了效率。而且日语翻译水平不敢恭维，川口听起来感觉别扭。接下来，一行人赴上海港参观。出面负责为外宾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这也是姚津津乐道的“成果”。红卫兵得意地为一行人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作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组织内又有人起来造罗明的反，发展到召开批罗大会。罗被中联部弄到“十八处”保护起来。

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日共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中日两共产党的对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决定将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绀野纯一调回日本。二人预定于8月4日乘朝鲜航班离京经平壤回国，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绀野在北京机场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决定批判绀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参加了绀野的批斗会。但绀野本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批斗会无果而终。

翌日，在首都机场又召开了以“人大三红”（人民大学第三红卫兵司令部）为核心的各大学红卫兵组织的批斗大会，规模很大。为此，川口等人将砂间从“十八处”带到机场。快到机场的时候，与正往这边赶

来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千人遭遇，砂间被抢走，押到机场候机厅开始批判。川口亲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侮辱。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共。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这一野蛮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因此，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终于挺不住了……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日本处的人着了慌，周总理对事态也很忧虑，严厉指示：“开大会可以，但时间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则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批判大会终于快挨到了尾声，砂间好不容易开始向飞机舷梯移动，接着又是一阵骚动。“他从机场大厅出来时，就被两旁排列的红卫兵殴打，挪向飞机舷梯时，连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们骂道：‘你是狗，爬着走！’砂间被孩子们敲打着，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达朝鲜平壤，据说绀野和砂间的肋骨都受了伤。”（见《蜀国漂流记》第108页）

对这种赤裸裸的滥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连川口自己，虽然“也认为那种批判大会太过无情，但嘴里没敢说出来”。

从“三线”疏散到返回成都

1969年10月，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经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所谓“一号命令”）的形式正式下达，引起各方震动。全国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开始疏散，外国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被疏散到乐至县。

乐至离成都虽然只有不到140公里，却是四川盆地的一个特困县，也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川口等日共党员，加上几名柬埔寨人、缅甸人，被分配到了县农机厂。厂里没有正式的宿舍，一座巨大的建筑被一分为二，一半为厂区，一半作宿舍。说是“宿舍”，不过是用席子隔成的临时隔间。床是在凸凹不平的泥土地地上搁块木板，板上垫着稻草，稻草上铺着席子而已。由于房间之间只有一席之隔，即使轻声说话，也会传遍各个房间。入夜，“不时传来嘁嘁喳喳的日语、汉语、柬埔寨语、缅甸语的交谈声”。

1970年，关于宪法修正草案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围绕在宪法中保有人民的示威游行权之“必要性”的问题，引发了一番讨论。对草案中“工人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一节，多数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主人翁。主人翁对谁游行示威？无此必要”云云。对此，周总理说：“毛主席认为，如果中国将来变色了，工人们可以用游行示威权与之进行斗争。因此，游行示威权是必要的。”（见《蜀国漂流记》第124页）而与此同时，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暗斗走向公开化。对于当时在县农机厂劳动的川口来说，尽管有权参加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讨论，但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则是无从知晓的。后来在回忆录中有所涉及，想必是他后来自己反思、学习的结果。

在乐至期间，川口的妻子李莲英患感冒，遂转成肺炎。由于她早年在日本患肺结核，曾接受过胸部成型手术，肺功能只相当于常人的一半，抵抗力低下。一时间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情况危笃。川口一面在病房里照料，一面暗下决心，一定要设法让妻子回国，“与‘白鸟事件’毫无关系的她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如果就这样回不了故乡，实在是太可悲了”。也许是他的祈祷起了作用，一个多月后，李莲英竟病愈出院了。

妻子的病倒让川口加紧对未来生活做打算，首先是要尽快离开乐至回成都：“林彪的‘一号令’已经作废，我们再没有呆在这里的理由。此地卫生条件差，妻子要是再度发病，恐怕就是灭顶之灾了。况且，呆在这种偏僻的乡下，作回国的准备也不现实。”同时，在乐至期间川口着手进行的两项理论研究（一是日共传统的战略理论“对美从属论”与毛泽东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关于现阶段在日本还存在的所谓“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观点的错误）也亟待回成都后完成。

“天遂人愿”——1971年4月，川口夫妇终于离开乐至返回成都，落户于红旗柴油机厂。这是一家有5000多名干部和工人的国企，加上家属，有一万多人生活在厂区，俨然一个小镇。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气锤。他一边在厂里劳动，一边着手与有关方面商讨回国的问题。

进厂不久，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小道消息便不脛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闻。随后，层层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通知》。接着，又下发了《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学习材料，由此展开了全国性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但不知为什么，从这以后，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参加学习讨论会。

1972年2月，尼克松闪电访华，举世震惊，也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中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多数群众对中央的“脑筋急转弯”持有疑问。于是，上方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以消除群众的疑虑。谈话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二是通过与美建交，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加深友好。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掠货。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对此，再次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



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力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来华，中日两国正式复交。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记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见《蜀国漂流记》第143页）

踏上归国之旅

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在北京见到了受日共委托来华协调有关工作的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三好一。在三好的带领下，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1951年后（即“白鸟事件”发生后）22年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启程回国，中联部干部段元培特来送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而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川口对自己从1950年起从事反政府地下活动，乃至“全部的生活完全从属于党”这点，始终无怨无悔，但却对流放中国18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见《蜀国漂流记》第153页）尤其是日中两党当初达成的除非日本革命成功，否则一生不许回国的无形协议，完全是基于组织高于一切的

“原则”，对党员个人生活的粗暴绑架。

川口夫妇被流放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坐大到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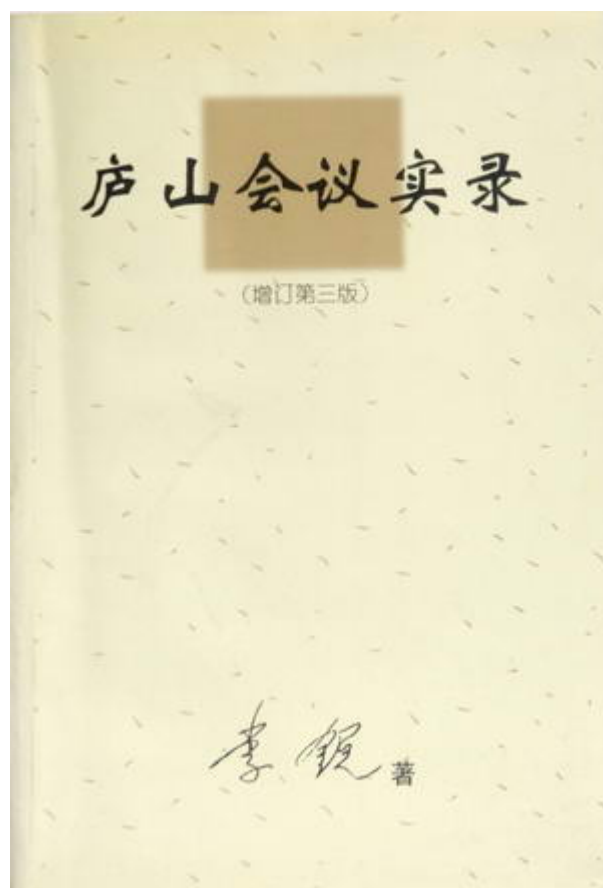
回国后的反思

1973年12月13日，川口夫妇搭乘的“圣山丸”抵达九州的若松港。在船上，川口曾做好了入关时会被日本警方逮捕的心理准备。但一切都很顺利，出乎意料地和谐，仿佛在梦中。夫妇俩不禁在心里感叹道：真的回来了。

在东京三好一的家里借宿一晚，翌日便拿着三好代购的车票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北海道士别市。18年前，日共党员川口孝夫还处于半地下状态，为武装革命付出代价；而18年后，日本议会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然定型，川口所隶属的政党早已放弃了武装夺权的幻想，转而谋求“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最高目标也从单独执政置换为树立“民主联合政府”，正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回国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的民间交流而奔波。他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超乎国籍的热忱。1981年，与友人共同创设了北海道中国研究会，并亲任会长，不懈地推动两国民间社会的深层沟通。与此同时，对自己在中国的18年流放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本身，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脱胎换骨式的反思，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随笔和书信，内容涉及唯物论、共产主义运动、民主集中制、人道主义、人权及民主主义等方方面面。而川口自己从被卷入“白鸟事件”，到被迫流亡中国，直到以一名“外来者”的身份深度介入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的罕见经历，恰恰构成了这种反思的起点和动力。反过来说，惟其有如此惨痛的经历，才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过去的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融入却不至主观，客观却不失“体温”的视角。这种看待中国的视角本身，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所稀缺的品质。

1997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川口接触到了李锐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展读之下，激动不已，当即决定与妻子一起翻译成日文，争取在日本出版，时值夫人荣子刚做过乳腺癌的手术。夫妇俩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译译，当年底即携译稿赴北京拜会作者李锐。在北京，与李锐两次长谈，“仿佛回到了1958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三面红旗’时代”，“茅塞顿开”。（见川口孝夫致日本学者及川淳子书信）李锐也非常同情川口夫妇的遭遇，称其为“过来人”。第二次谈话时，荣子夫人不揣冒昧地问李锐：“中国也有不少像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那样优秀的革命领导人和元帅、将军，这些人为什么没能阻止毛泽东像皇帝一样的



独裁？”李锐回答说：“不行。毛泽东是皇帝，其他领导人是臣子，是皇帝的驯服工具。”李锐的话，使这对“过来人”夫妇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临别时，李锐把自己的旧著《毛泽东的壮年与晚年》赠与川口夫妇。翌年夫妇将其中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译成日文，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共产皇帝”支配现象，成了川口解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共党史真相的一把钥匙。更通过李锐的介绍，川口第一次听说1974年不幸离世的中共党内思想家顾准的名字，并开始了对顾准思想的研读。顾准的《科学与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文章对川口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川口比李锐小4岁，比顾准小6岁，同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20世纪末与这两位中共党内精英知识分子的邂逅，对川口晚年的思想蜕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把李、顾二人看作是自己的“恩师”：“我在回顾、检讨20世纪及其中自己所活过的这80年历史的时候，如果说多少有点进步的话，那端赖李锐先生和顾准先生的教诲和引导……我虽然与二位算是同代人，但水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我尊敬的前辈，思想和理论上的师长。我将在人生行将结束的时候，得以认识如此杰出的先生而感到喜悦、骄傲。两位是我人生最后的恩师。只要我一息尚存，也会追随他们。”（见川口孝夫《八十岁人生与20世纪的总结——关于李锐先生与顾准先生》）



进入21世纪，川口已届暮年。从1945年秋天，在香港英军战俘营中第一次了解“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那天算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把“社会主义”当做人生的至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全然不顾代价。因卷入日共内部斗争而被流放到社会主义中国，历经18年艰辛，终于辗转回到祖国，但日本已变成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走向离日共的政治目标渐行渐远。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转型。紧接着，“苏东波”袭来，传统社会主义体系崩溃，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转向，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致力于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当初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见川口孝夫《关于中国的回忆》）痛定思痛，耄耋之年的川口曾写下过这样一段痛切的思考：

我迎来了人生的80岁。在面向21世纪之际，尽管姗姗来迟，但我终于发觉原来自己曾信仰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小布尔乔亚农民式的乌托邦空想。我自己是农民，我是抱着为农民伙伴求解放的想法参加了革命运动。但是，小布尔乔亚的立场和狭隘的视野容易接受毛泽东式的平均主义——农民的乌托邦。我不得不说，自己80岁的人生是追求空想的愚蠢的人生。但是，经过漫长艰苦的斗争，可以说好不容易接近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只有经过实践才有可能接近正确的认识。以打倒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斗争实践的结果，是让我们再次认识到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并且还在发展的事实。（见川口孝夫《关于中国的回忆》）

经过如此刮骨疗毒般的反思，深知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川口，越发痛感对历史和人民的责任，晚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了回忆录《蜀国漂流记》，后被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但碍于种种原因，对作为川口流亡中国的直接起因的“白鸟事件”的背景，书中仅在最后一章《我与“白鸟事件”》做了极其简单的介绍。据说作为“绝笔”，川口另撰有专文，详谈事件的背景。但川口歿后，文章由一位夫妇晚年生活上承蒙关照的至交继承管理，何时面世，尚在未定之天。无论如何，这几乎是可望揭开“白鸟事件”这一尘封近一甲子的历史悬案真相的唯一线索。

魂归“第二故乡”

2001年9月18日，川口荣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83岁。夫妇一生未生养儿女，晚年生活由一位仰慕川口老人的友人照料。川口孝夫其人虽然在日共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因“白鸟事件”的关系，却是在日本战后史上留下名字的人。所以，对川口之死，当地报纸《北海道新闻》刊发了消息。但耐人寻味的是，大约是出于某种事关党史的讳莫如深的考虑，日共机关报《赤旗》则只字未予报道。



按川口夫妇的遗愿，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后将其一半撒到“第二故乡”四川的河川大地。2004年12月22日，川口夫妇的遗骨在两位日本朋友的专程护送下，魂兮归来。在川口夫妇流放蜀地的岁月，与在一起工作生活过的同事、友人，彭州市各界人士60余人两位老人举办了一个追思会，然后把骨灰撒向了汨汨流过成都郊外的著名生态旅游区龙门山回龙沟的白水河里。

图1为川口孝夫；

图2为1963年开始农村开展“四清”运动；

图 3 为田中角荣访华;

图 5 为 1997 年, 川口孝夫(中)回到中国;

图 6 为川口孝夫夫妇骨灰撒放仪式。

[日]川口孝夫:《蜀国飘流记》, 张建国、段小丁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8.8 元。

BOOKREVIEW 书评

彼得·德鲁克的误记与栗本慎一郎的执著

——关于波兰尼的一家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

去年 10 月, 研究波兰尼(也有翻译成“博兰尼”的)的专家古里克(Walter Gulick)、缪林斯(Phil Mulins)访问华东师范大学, 做了演讲, 卡尔·波兰尼和迈克尔·波兰尼兄弟俩的著述又引起部分学人注意。进入 21 世纪, 迈克尔·波兰尼借了哈耶克和朝圣山学社的光, 不少著述有了中译本:《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自由的逻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科学、信仰和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社会、经济和哲学: 波兰尼文选》(商务印书馆, 2006 年)。2007 年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也有了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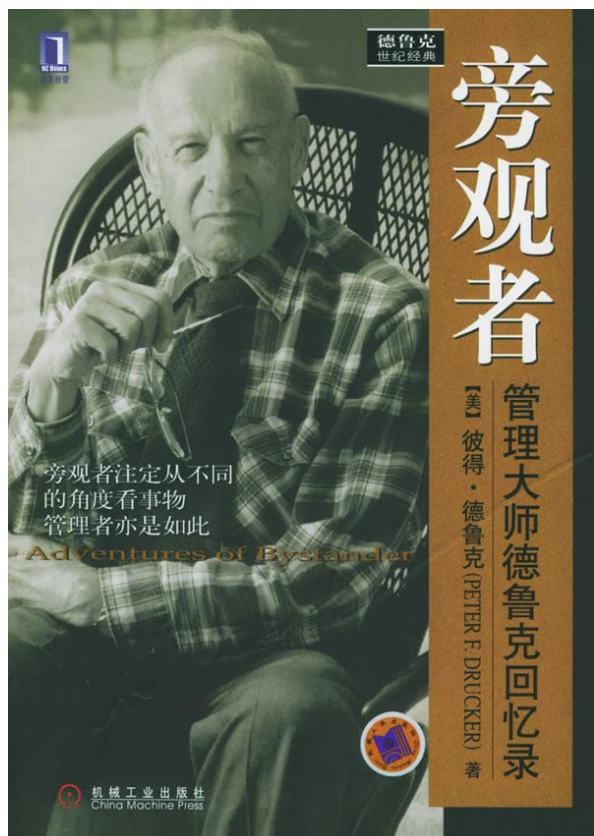
其实, 比较早把兄长卡尔·波兰尼的经济学的理论通俗地介绍到中国来的, 倒是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栗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 1997 年)。而栗本的这本《经济人类学》却是中文版问世 18 年前——1979 年在东京印出第一版的。因为日本老一辈传统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在 1968 年激进的学生运动中, 表现出轻视大众文化、大众运动的权威、精英态度(最典型的如丸山真男), 1970 年代起, 渐渐失去了对社会运



动主导地位。因此, 1970 年代后期, 欧美的非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最先是后结构主义)开始在日本文化界繁衍, 尽管来自欧美各流派取向各不相同, 没有共同的政治理论体系, 彼此也有对立、冲突, 却都被日本人照单全收翻译、介绍, 在一些非主流、边缘的人文学科, 特别是像文化人类学那样容易跨越学科边缘的学科的大学人中流行起来。(除了栗本, 出名的还有山口昌男、中泽新一)。与老一代学术权威不同, 许多学术明星多在学院之外的媒体上展开他们的言说, 他们的著述产生的影响力, 与 1980 年代越发产业化的媒体传播力日益广泛也不无关系。另一方面, 虽然这些学者不居于大学学术的核心, 但是他们与学院派的学术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大学里形成一股“新经院主义”思潮。栗本慎一郎也是当时学术界新明星。像他那样年龄(生于 1941 年)的日本学者中, 很少有在 20 世纪两本书被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后学”左

翼学者群体（柄谷行人、小林阳一等人）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还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几年的事情。1988 年工人出版社还推出过 1981 年日本的畅销书、栗本的《穿裤子的猴子：人类行为新析》中文版。很明显，《穿裤子的猴子》是对当时时新的法人乔治·巴耶塔“过剩—耗尽”理论的图解。

这位栗本慎一郎不仅翻译、传播卡尔·波兰尼的经济学说，还是波兰尼兄弟的忠实粉丝。1979 年刚与玉野井芳郎一起翻译完卡尔·波兰尼遗著《人的生计》（*The Livelihood of Man*；此前，1975 年还与端信行一起翻译过卡尔的《达荷美与奴隶贸易》），对兄弟俩的身世也很关心。他从刚出版的《旁观者的冒险》（*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中译本为《旁观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的第六章得知彼得·德鲁克与波兰尼一家有过密切交往，兴致勃勃，马上去信向德鲁克讨教几个关于波兰尼兄弟的问题。不久，恰逢德鲁克 1980 年初夏访日（为了那年在克拉莱蒙特大学开设日本画讲座做准备。那时候他对日本感兴趣，访日脚头甚健）。德鲁克到了东京后为此打电话给栗本慎一郎。得知世界经济管理学权威约见自己，栗本喜出望外。可是德鲁克到他家里两人一番畅谈后，栗本很失望，不仅德鲁克回忆的波兰尼家世，与自己所知道的出入很大（之前，翻译《人的生计》一书时，栗本慎一郎已经与卡尔·波兰尼妻子伊洛娜有过联系，伊洛娜为此书写了序言），更主要的是，德鲁克交谈中坚持认为卡尔·波兰尼反市场经济观点是错误的，是个失败的学者。在德鲁克早期著作《经济人的终结》、《产业人的未来》中已经可以看出他与卡尔·波兰尼观点相左。而当年卡尔正是把自己与德鲁克讨论时产生的思想火花、形成的观点写成了《大转型》。自称是卡尔·波兰尼的徒孙的栗本，不受德鲁克对卡尔·波兰尼评价的影响，第二年就兴冲冲地赶到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北美去，走访波兰尼家族的后人，不仅考证波兰尼家族史，还要亲身在匈牙利实地体验波兰尼一家在 20 世纪初布达佩斯思想史上产生的伟大影响。



回日本后，栗本根据自己的采访写成学术随笔《布达佩斯故事：追访现代思想的源流》，活泼地记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波兰尼家族及其周围左翼知识分子在布达佩斯留下的革命和文化的足迹。《布达佩斯故事》，关于波兰尼家族的不少内容与德鲁克的《旁观者》第六章大相径庭。比如，德鲁克在《旁观者》中写到：除了长子阿道夫（德鲁克把他作为次子），卡尔和迈克尔还有一个大哥奥托，奥托到意大利去开了家汽车零件厂，为菲亚特提供零件的实业家，政治上是个过激的社会主义者，曾与墨索里尼关系密切。其实，这个奥托是卡尔、迈克尔的表哥——姑母的儿子。再如，他们的父亲并没有像德鲁克所说当过奥匈帝国铁道部长；父母也不是在瑞士相识恋爱的，是在维也纳。母亲当时是宝石店店员。并非俄国贵族出身，是立陶宛犹太教拉比的女儿。德鲁克把他们父母结婚年龄搞错了，如果按照德鲁克的说法，结婚时卡尔、迈克尔的母亲才 6 岁。

栗本在书中还指出德鲁克其他种种记忆上的错误：卡尔的妻子伊洛娜的父亲也没有当过匈牙利国营铁道公司总裁；伊洛娜虽然曾是匈牙利共产党党员，但是共产党创建时才 17 岁，并非党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是她再婚的丈夫，等等。据栗本说，接受他采访后，卡尔和迈克尔的大姐拉乌拉的儿子施特利凯尔给《旁观者》的出版社（Harper & Row）写了澄清事实的信；二姐索非亚的女儿梅尔茨也为此给《纽约书评》投稿，

纠正德鲁克《旁观者》中的谬误。(62—63页)但是他们(包括栗本)都认为德鲁克并非故意误记,只是无意识中的误记,因为德鲁克在卡尔流亡英美,到了英美后介绍大学教职、著述在美国的出版等事情上都出了大力。德鲁克的其他许多著作,都有一个特点:风趣而没有注释——他注意的时代、事物发展的大致方向,而不拘泥于具体事实,所以,他在《旁观者》中会带有调侃地说卡尔·波兰尼到了英美后“选择了撰写充满注释和引文的论著的学究生活”。

至今卡尔·波兰尼也没有指责过德鲁克学术规范不够,要摘去他管理学权威的头衔。西方学人的学术规范,依赖个人的自律和群体的良知,做偷鸡摸狗的事情的人极少。没有这种自我约束,再多、再繁琐的规范,遇到权力和金钱、名利,就会成了例外,规范只能成为摆式。学术及其规范,只是整个社会得一隅,我国出现有人提倡规范以来10余年间,反抄袭、剽窃口号越来越响,明知故犯不守规范的人越来越多,真要提倡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的个人,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相反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们,抄袭白败露后,依然可以坐稳在大学校长交椅上,头上的学术权威光环依旧闪耀着光芒。

栗本的《布达佩斯的故事》问世二十多年后,德鲁克在2005年《日本经济新闻》连载的《我的履历书》(后以《ドラッカー20世紀を生きて:私の履歴書》书名出版,英文书名为*My Personal History*)中,还是提到1930年在维也纳《奥地利经济周刊》编辑部与主编卡尔·波兰尼相识,1937年流亡美国后与波兰尼一家保持友情的往事。这也说明了当年德鲁克并非故意误记。



1970年代后半至1980年代前期,是栗本慎一郎学术活动的顶峰时期,《布达佩斯故事》今天读起来,应该说还可以感觉到其相当的学术含金量。因为栗本最主要写作目的并不是纠正德鲁克的误记,而是通过回忆波兰尼家族及其周围左翼文化人在1918—191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文化活动来证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欧,不仅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的文化圈也有过辉煌一页。以布达佩斯大学伽利略小组、《20世纪》(*Huszadik Szad*)杂志为据点,与波兰尼兄弟在一起从事社会主义宣传的有:绍博·欧文(*Szabó Erwen*)、阿迪·恩德莱(*Ady Endre*)、约齐·奥斯卡(*Jszí Oszkár*)等人。书中,栗本特别把卡尔·波兰尼兄弟等人主张的社会主义,与卡尔·波兰尼的好友卢卡奇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区别开来,力图描绘出波兰尼兄弟的社会主义信仰正是伊洛娜在《人的生计》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人道主义者,也是优秀的现实主义者。”卡尔·波兰尼领导的伽利略小组追求的社会道德契约,是以后兄弟俩学术思想的一个汇合点——也就是古里克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中所说的波兰尼兄弟俩学说“有一致的

核心价值”(共同之处大于分歧)之历史源流。

波兰尼兄弟俩中,栗本慎一郎更加敬佩弟弟迈克尔——横跨文理两大领域的高峰,进入1980年代中期,栗本甚至狂妄说要继承迈克尔的默知理论,建立一个超越社会科学,包括所有学问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同时他还激烈批评后学者群体专心于媒体写作,追求提高知名度和收入,避开相互间的批判和论争。当然,最终这个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他的理论只是停留在“社会变化导致身体相应变化”那个结论上。正像他当时在同仁中自称自己是个“危险的学者”那样,以后栗本的走向,抛弃了当年的执著,与他在《布达佩斯

故事》中的追求南辕北辙，非常离奇。1991 年因为“明治大学招生腐败案”辞去明治大学教授后，他先是短时间栖身于媒体，1993 年作为小泽一郎的新生党推荐的候选人，参加众议院竞选，当选后加入新生党。未几，又投向自民党，作为自民党候选人参加 1996 年选举，当选众议员。1997 年还担任经济计划厅的政务次官。在 1999 年东京都知事竞选中支持石原慎太郎，……那年 10 月因脑梗塞倒下之后，栗本政治生涯从此一蹶不振，在 2000 年选举中，大败，而后退出政界，回到大学执教。栗本依然勤奋写作，兴趣转向关于脑疾患研究，今天的著述已经完全没有近 20 年前叙述“布达佩斯故事”的那种正气、灵气、锐气和豪气了。

图 1 为卡尔·波兰尼；

图 3 为栗本慎一郎。

【日】栗本慎一郎：《布达佩斯故事：追访现代思想的源流》（ブダペスト物語：現代思想の源流を訪ねて），晶文社，1982 年。

BOOKREVIEW 书评

现代诗歌：燃烧的荆棘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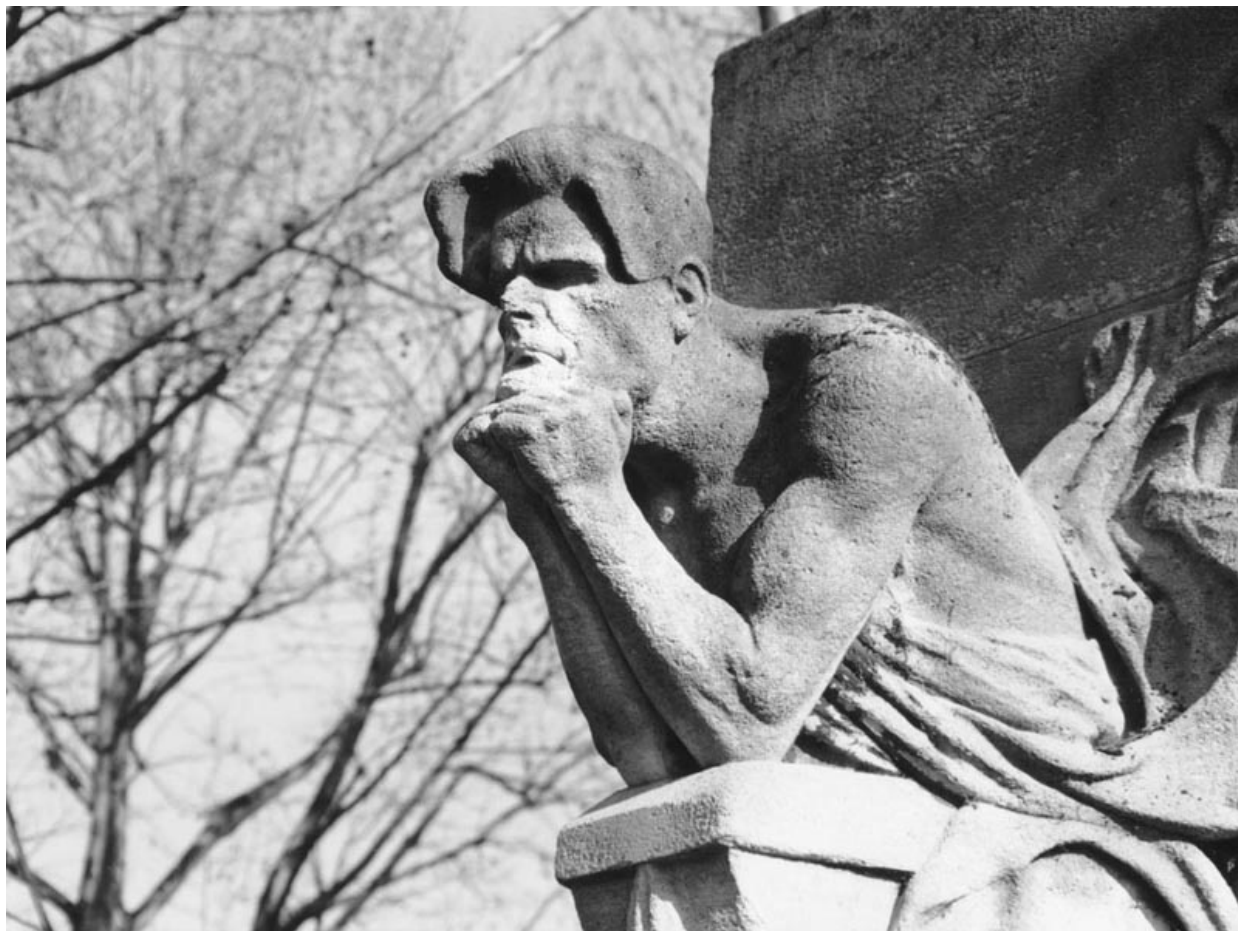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没有你出现，出现的只是额上的一缕头发；但是这头发也以隐喻的方式转化为了一束火焰，这火焰从自身中释放出了一整条燃烧的图像之链；这图像链是这首诗歌的感性事件。”这是从《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中随意抽取的一句话，这既是分析又是感性的表达，诸如此类的语句最终将《现代诗歌的结构》塑造为一部堪称迷人的批评著作。很少有理论著作可以用迷人来形容，理论著作通常的分析性语言，往往将它们自身置于感性的对立面，睿智和逻辑链条的缜密往往就是对它们最佳的褒扬了。《现代诗歌的结构》当然不乏鞭辟入里的分析，甚至其分析的密度和精微一般的批评著作根本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恰恰这种极度理性的思维之线的复杂缠绕让人眩晕，很多时候这种眩晕和诗带来的眩晕属于同一维度内。也就是说，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中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和所评论的那些杰出诗人的诗作相得益彰，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诗作所携带的光芒也映射到弗里德里希的这部著作中，所以在读这部作品时，我们也会收获通常只有诗歌带给我们的意外和愉悦。



在《法国的浪漫主义》一节中，弗里德里希虽然不无远见地将现代诗歌创作称作是“去浪漫化的浪漫主义”，但整部书的主要工作正是在于通过对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经典现代派诗人的分析，去找寻现代诗歌独立于传统浪漫主义的内在结构和特征。对于现代诗歌是什么，弗里德里希明智地没有给予任何定义，他在《第一版序言》里并不确定地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会从本书自身中呈现。”任何简单归纳都将是破绽百出的，只有循着优秀诗人诗作的轨迹，人们才能偶尔一窥其中堂奥，这就像出色的诗人也充分意识到循着表层意象才能窥探事物内在肌理一样，一部试图归纳现代诗歌内在结构的作品，它自身却依然很难被归纳，这体现出它的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弗里德里希附着在所研究对象之上的“结论”的复杂性。其中的迷局既是魅力之源也是制造理解障碍的始作俑者。



作为一个诗歌新时代的鼓吹者，弗里德里希并没有草率地割裂现代诗歌和过去文化形态的联系，在第一章《展望与回顾》中，他为现代诗歌找到自身的理论之源：卢梭、狄德罗和诺瓦利斯。在晚年作品《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卢梭成功地表达出一种前理性的存在确定性。这种确定性的内容是一种梦中的迷蒙，这迷蒙从机械时间沉入了内心时间，内心时间不再区分过去与此刻、纷乱与适意、幻想与现实。而内心时间最终构成一种现代抒情诗的圣地，让后来的诗人们得以脱离挤压人的可憎现实。狄德罗则通过对于“天才”的表述（“真与假不再是天才的区分标准”），赋予幻想前所未有的能量：这是一种精神强力的自我运动，对其质量的量度要依据其产生的图像尺度，依据其理念的作用暴力，这种动力抛开了善与恶、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狄德罗打开了诗人想象的最后一道阀门，现代诗歌炫目的意象、奇诡的想象力多半源出于此。诺瓦利斯的诗歌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诗歌，那些特质正是弗里德里希试图从现代诗歌那里剥离的，可是诺瓦利斯在《断片集》及《奥夫特丁根》中所写下的反思要比其诗歌作品更加超前，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对艺术自觉的强调：诗歌魔术是严厉的，是“幻想与思想力的统一，是一种操作”；

诗歌语言“就如数学公式，它们制造了一个自为的世界，只与自己本身游戏”。——以上卢梭、狄德罗和诺瓦利斯的不无试探性的观念要到 19 世纪，在波德莱尔那一代诗人身上才得到热烈响应，并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结出硕果。

《现代诗歌的结构》的副标题是“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的抒情诗”，全书论述了十几位现代派诗人，但弗里德里希并没有将精力均衡地花费在这些诗人身上，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给予了波德莱尔、兰波和马拉美，相应地对于这三位诗人的分析也是全书最出彩的部分，弗里德里希将对这三位诗人的热爱化解在他条分缕析的解读之中，并据此提炼出他认为的现代诗歌现代性的主要征候。波德莱尔现在已是公认的现代诗歌的源头性人物，在波德莱尔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中，《现代诗歌的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在此之前许多人包括艾略特、瓦雷里都赞叹过波德莱尔的诗，但是弗里德里希集中做出了准确又清晰的历史评价，阐明波德莱尔的诗歌有着怎样的转折性意义。弗里德里希首先指出波德莱尔的独有问题在于，在商业化和技术化的文明中，诗歌如何成为可能。他的诗歌展示了这条道路，他的散文则从理论上详尽探讨了这一道路。随后弗里德里希指出波德莱尔诗歌去个人化倾向：《恶之花》不是自白式抒情诗，不是私人状态的笔记，毋宁说它主要是一件被诗人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其中包含的孤独、寡欢、受病之人的痛苦和典型的浪漫主义诗歌不同，是控制在一双专注于语词效果的眼睛的打量之下的。在一封信中波德莱尔谈到“我诗作中有意为之的非个人化，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一种抽象效果，那就是试图表达出人类所有可能的意识状态”。基于这个原因，波德莱尔没有为自己诗作（像经典的浪漫主义诗人那样）标明创作日期，而且精心在结构上把《恶之花》塑造为一个有开端、分段的进展和结局的整体。弗里德里希对波德莱尔诗歌的分析，仅就其观念而言，在今天看来并不新鲜——这并不奇怪，《现代诗歌的结构》出版于 1955 年，由于此书巨大的影响力，其中的许多观念都已为后世学者和读者广泛接受，但是我们今天看这本书，依然会被书中美妙的笔触所打动，弗里德里希以其杰出的文字能力为自己更强调形式的观念做了最好的演绎。另一方面，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弗里德里希在材料的掌握上显然花费了很大精力，他所引的波德莱尔观点就算是熟悉波德莱尔著作的读者也会觉得新颖，而且其中蕴含的深意也为弗里德里希精妙的阐发奠定了基础。比如：“艺术的神奇特权就在于，可怕之物经过艺术性的表述，会成为美；节奏化了的、分段表述出的痛苦能让头脑



充满一种宁静的欢乐。”这句话是对整个浪漫主义真诚观念的猛烈一击，同时为弗里德里希阐明诗歌要与心灵分离，形式要与内容分离的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如果说对波德莱尔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有关兰波的分析则显弗里德里希超强的文本分析能力，因为和波德莱尔相比，兰波的诗句无疑更加晦涩和支离破碎，面对这样的诗句，绝大多数的批评家只能张口结舌或者只是在兰波的生平等外围资料上做些文章。我一直关注兰波诗歌，在我印象中，没有哪位批评家能像

弗里德里希那样，将自己的分析深深扎根在兰波那炫目的诗句内部，不让相对容易掌握的传记资料来打乱自己的节奏。在对兰波诗歌的分析中，弗里德里希提出几个重要的诗学概念：感性非现实和专制性幻想。

所谓感性非现实是指事实上不存在的构成物（比如“肉之繁花，在星辰之林中浮现”等），通过词语本身的紧缩、省略、移置等强制作用变得迷人，它要比那些庸常的现实更加打动人心，如此艺术也就超越了对物质现实的简单描摹，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和感性，反而更加逼真地呈现出人们在心理时间和空间里的种种感受。所谓专制性幻想其实是指某种强力幻想，借助这种幻想，诗人可以颠覆人与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公证人悬挂在他的表链上”），也可以强行让相距遥远的事物相连，让显明之物与想象之物相连；这幻想可以涂抹出非现实的颜色（蓝色的水芹、绿色的钢琴师等等），也可以使原本单数的实物变为复数。无论是感性非现实还是专制性幻想，它们都是为了颠覆现实实有的秩序和实在的关系，以迎合人们内心的强烈愿望，而诗歌被确认为从庸常现实上起飞梦想，现实的底座则确保这梦想有着几可乱真的“真实感”，从而更加撼动人心。诗不是对事物的简单描摹，它是调动人们感受力的富有魔力的词语组合，这种语言魔力和人们内心的疯狂相契合，而诗歌正是这两种魔力合力的产物。



马拉美曾坦言，他是从波德莱尔必须止步处开始的；在《现代诗歌的结构》中我们也可以获得这一印象——有关马拉美的分析是全书中最深奥难懂的，弗里德里希也直观地表述过相同的意思：马拉美的诗作“表现出的抽象程度远胜过兰波的喧嚣”。波德莱尔、兰波的创作可以视作对传统浪漫主义挑衅性的反叛，那么他们作为传统诗歌倒影的作品依然可以从传统路径中依稀获得某种完整的阐释。马拉美的创作则是在波德莱尔轨道上持续地深入，他成功赋予波德莱尔的观念一种本体论的解释，他也为诗歌的晦暗、诗歌对可理解性之限制的偏离提供了本体论的解释。在马拉美的诗作中，诗歌创作与对诗歌的反思首次被等量齐观，马拉美一生精雕细琢的少量诗歌几乎完全指向诗本身——也就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在这里，诗和存在首次达成某种亲缘关系，这比海德格尔的哲学早了很多年。但是正像弗里德里希指出的那样，马拉美的诗作并没有说教气，他对“静默”的挺进勇猛又倔强，

这或许是因为马拉美清楚地知道，诗歌在极度的抽象和多义性中反而格外需要形式的维系，作为其歌吟的轨道和尺度。马拉美的诗及其对诗的思考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自18世纪以来的美与真之间的分离已然实现。在这种近乎决断的乐观的语气中，弗里德里希敏锐地为自己的观察埋下伏笔，他解释道：“然而恰恰是具有绝对形式的美提供了保障，让逻各斯的光辉，人性本质尊严的光辉即便在面对虚无时也不至于熄灭。”而在另一处，当他说马拉美将抒情诗提升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时，他也立刻补充说：“这并不是一个让人幸福的高度”，因为“它缺少真正的超验者，缺少众神。”

作为一个嗅觉极为敏锐的学者，我们可以看到当弗里德里希沉浸在批评文本自身的愉悦时，对自身观点所持的审慎态度，但是他不可能面面俱到，否则他将摧毁自己正在建设中的理论巴别塔。悖论的是，显然的几处漏洞也为弗里德里希的观念增添了几抹亲切的色彩，反而让它们变得更加有说服力。被许多人提及过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弗里德里希为“现代诗歌”选取的样本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遗漏了大多数19世纪末以来杰出的德语和英语诗人，比如叶芝、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特拉克尔、惠特曼、狄金森等等，因为这些诗人不能为弗里德里希煞费苦心提炼出来的“结构特征”所涵盖。再者，弗里德里希的高明之处

在于对诗人写作过程的细致考察，典型如音韵对诗人选取词语时的引导作用，优美的音韵往往会把诗人引领到令他自己都惊讶的意义的处女地；他的许多观念的提出由于这个原因而别具魅力，可是对写作方式的了解并不能取代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一首诗就算具有弗里德里希所阐发的感性非现实以及专制型幻象的写作手法，但并不能就此逆推这就是一首好诗，尽管弗里德里希都是从杰出诗人和作品中推导出这些巧妙地手法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弗里德里希提到过，但没有再深究的那个“缺少众神”，这是对马拉美高深诗作的批评，背后其实蕴含着写作的动力系统问题，执着于形式分析，往往会忽略一个诗人写作时所拥有的浑浊动机，一首好诗往往和批评家精深的分析不同，往往是诗人处在迷醉状态时一挥而就的，同时又符合批评家的复杂分析。没有办法，人类的理性分析似乎总是跟不上感性狂欢的节奏，对于诗歌的分析往往也需要诗歌所擅长隐喻才能相对说得完善。弗里德里希对现代诗歌精彩的理论分析似乎就不如纪德的一个比喻来得准确和传神，在对兰波诗作评论中，纪德恰切地将现代诗歌比作“燃烧的荆棘丛”。这一丛火红的荆棘包含着“感性超现实”，包含着“专制性幻想”，也包含弗里德里希不曾触及到的忘我的热情。

图 2 为蒙巴纳斯公墓里的波德莱尔的纪念碑；

图 3 为莱昂纳多饰演的兰波；

图 3 为画家高更为诗人马拉美画的肖像。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 年 8 月，28 元。

BOOKREVIEW 书评

书评教父如是说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pessoa1935@163.com）

有些人撕咬别人
手臂或脚腿或任何其他

撕咬在利齿之间
而后尽快逃逸
将它埋于泥土中

其他人则四面八方奔跑
嗅寻又嗅寻
翻遍所有的大地

如果幸而找到他们的手臂
或脚腿或任何其他
则开始轮到他们撕咬

这个游戏带劲地一直继续

只要有手臂
只要有脚腿
只要有任何其他
——《他》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黑暗中
单独而未得到时间的帮助

我们怀疑这究竟是否
为一场欢迎仪式做准备
或只是永远的诀别！

而真正的答案仍在人们自己。
——《准备欢迎仪式》（节录）

我从我的脸上抹掉你的脸
从我的影子切除你的影子

削平在你里面的山峦
将你的平原变成丘陵
设定你的时季和我相异
从你那里找到世界末日

遮掩掉我与你有关的生命轨迹
我那固执而不可能的道路

而今你只要发现我就已足够！
——《从我的脸上抹除你的脸》

南方朔的专栏集《有光的所在》，书封上五个字堆得很奇怪。随手翻翻，就看到《一个塞尔维亚诗人的告白》，文中收录了上面三首诗，作者叫瓦斯可·波巴（Vasko Popa, 1922-1991）。这三首诗让我收起了“钉书钉”的打算。十五年前混录像厅，七点钟按例是要放香港大片的，某晚不知道老板发什么神经，塞了一部十分奇怪的电影，看得人晕乎乎的又记忆深刻。那时候年轻，口味兼容并包，硬生生挺过来了——有过录像厅岁月的朋友应该明白，所谓奇怪的电影，港产片也有不少。这部《山雨欲来》（Before the rain）后来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译名《暴雨将至》，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电影开头引用的诗：

鸟儿吱吱叫着飞越漆黑的长空
人们沉默无言
我的血也等到痛了



是这句一直记得的诗促使我买了《有光的所在》。回来翻旧笔记，却不对。作者是 Mesa Selimovic。那么就读南方朔。

一般来说，专栏文章既已读过，结集就很少买来读了。有些没有读过的书评结集，总想抄几本没有见过的书来，但一本抄不到也是常事。不过，好就好在专栏结集文章短，好看，可以一气读下去，不满意则跳着看，也可以随时放下——恕我不能像等专栏那样苦等了。《有光的所在》勒口介绍说，南方朔是《亚洲周刊》的主笔，台湾最为重要的时评家、政论家、书评家，博览群书，是台湾书评界的“教父”。附会另外一个形象来表达自己，“穿裙子的马尔克斯”这样的，迹近惯例，也无可厚非，因为可以给完全不知情的读者较为准确的第一印象，但是否准确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倒是听到过朋友参加了“教父”与一些大陆学者的研讨会，回来赞叹他视野广阔。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读到“教父”在中时人间副刊上的评论《帕慕克的深度 关切各种人的生活方式》，虽属急就，总还没有惯常读到的“我与诺奖得主……”那股附骥的味道。对我来说，这两种印象很重要，甚至比作者是否是“书评界的教父”还重要。

这几年常听到一种说法，大意是台湾传统媒体的副刊日益萎缩，人文阵地一去不复返，同行如我不免有些杞忧，但是《有光的所在》的文章最初是发在台湾《自由时报》副刊上的（见自序），这能否小小说明一点问题呢？书中《西南联大的旧教科书》一文有一段说：

《未央歌》写西南联大的小男小女，它温馨可爱，可是连一点点时代的信息都未曾出现在书中出现。看着《未央歌》，想着西南联大那些教科书，到底哪个西南联大才是真正的西南联大？梁实秋写文章很少写实景实况，但在《雅舍小品》里他写西南联大教书的那个时代，多少也还透露出一点时代的讯息，太写实和太不写实，都是矫情，鹿桥是后者。（页49）

《未央歌》因黄舒骏之故在大陆久有盛名，大陆版出版后也颇见评说，但如南方朔所说的“矫情”，却似乎从未有人论及。

从西方古典汲取养分自不稀奇，及时从西方的人事梳爬出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既见视野之广，也可见出文章手笔的排遣。如写到教宗保罗二世的诗歌，西方华裔作家的状况，黎元洪的后代黎里洋（同时也是袁世凯的后代），都可见其广博，对资讯的把握尤可见其对书评的专业——这个年代，并非占有的消息

越多越好。我当然佩服他一文一事均有所指，指向他生活的台湾社会，不论一段文、一句话、几个字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但确实尽到了一个作家占有几百字豆腐块那点阵地的应有之义——面对大众，说出一些真实的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由英国诗人奥登吟咏政治的诗歌所发的议论：

类似于奥登这种境界的诗，在近代的欧洲可谓车载斗量，也正因警惕到当权力可以摧毁一切，而“被打败的历史，在惊惶中不会援救也不宽恕”，人们对权力的危险，对人治的恐惧，以及对各种虚构的神圣性遂格外有所警惕。戴高乐乃是法国近代少有的英雄，1969年企图扩权，立即被百姓驱逐；尼克松当年选举赢得山崩式的胜利，水门一案也被拉下台来。进步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分野，在于进步国家能从古往今来之中领受到教训，不让一切事务发展到不堪闻问时才知停手；而落后国家则是知识分子、政客官僚以及大众都缺乏胆识和觉悟，不到大难临头就不会回头。进步与落后的差距，在于进步国家会把极端政治的光谱缩减到很窄的范围内，落后国家则否。（页 290）

这样的观点什么时候看都不过时。就诗评而言，领悟力与阐释都非常到位（读过长篇诗评的朋友或许会有体会）。不过，正如我欣赏南方朔对《未央歌》的评价，他对文化人物、文学作品的寥寥数语，往往如短兵相接般直接有力，直中要害。他评价林语堂之“琐碎”（《歌颂琐碎》，页 123-125），即见心思：

他所处的时代，太多人不是赶搭这个政治巴士，就是抢上那个权力轮渡，只有他自动靠边站，宁愿当个“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就是这份耐得住寂寞的胆识，不想在浪尖上逐高低的本色，就已极为稀罕……

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生活的艺术》，全部在说衣食住行等琐事，最后则将人的有品无品归结在生活中。人必须懂得在生活的琐碎中治理自己，而品格的高下也就隐藏其中。这就是有格调的琐碎。

而能以格调自期的人，当然不喜欢和别人讲一样的话，也不会去附和那些每个时代的八股。他喜欢和普通人厮混，宁愿逛街，在人与人之间寻找趣味，做真正的自己。他也评论时事，但不是用自己代表了真理的那种态度。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最后一定弄坏了天下，他可没想加入那样的行列。他只想做个真正的自由人。

这段评价与其说是关于林语堂的，不如说是关于林语堂的对立面的。林语堂固自少见，但众所周知，“用自己代表了真理的那种态度”的人可是每个时代都不少见，而我们往往是在这两者之间的芸芸众生，知晓这两者之不同份属必要。这些琐碎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基因、租书摊、打工回忆，萤火虫，骑楼，等等。如何将经历、才情、智慧熔合于千字之中，自然可以明了短文章的难写，这也是书评/专栏这类一次性消费的文字产品试图进行二次消费甚至多次消费的必杀技欤？



附记：刚读此书，以为电影开头引用的诗作者是 Abdurahman Salja，最近重看《暴雨将至》，发现 Abdurahman Salja 出现在电影结束，附有 1922-1994 字样，不知道是不是致敬？Abdurahman Salja 似乎是南斯拉夫的一位演员，而《暴雨将至》是 1995 年的电影，拍摄于他去世之年。至于引首诗歌的作者 Mesa Selimovic 是南斯拉夫的一位作家(1910-1982)，其小说《苦行僧与死神》改编过电影(1974)，Mesa Selimovic 在《暴雨将至》这个年代其归属应该更明确——波黑，而同样是南斯拉夫诗人的 Vasko Popa 却是罗马尼亚人，最近发现台湾张香华编译的《南斯拉夫当代诗选（1950-1995）》（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也选了他的诗，《他》翻译成《你追我捕》，相比之下，还是南方朔的译本更像诗。

图 1 为《暴雨将至》剧照

INTERVIEW 访谈

“归来的陌生人”：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

——专访“汉语法学文丛”主编、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

特约撰稿人 灵子（北京，liufang0815@gmail.com）

“汉语法学文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至今）目录

第一批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

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

许章润：《法学家的智慧》

许章润：《说法 活法 立法》（增订本）

第二批

萧公权：《宪政与民主》

黄静嘉：《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

张君勱：《宪政之道》

燕树棠：《公道、自由与法》

许章润：《以法律为业》

第三批

马汉宝：《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

张君勱：《政制与法制》

张佛泉：《自由与权利》

张伟仁：《磨镜》

於兴中：《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然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两场争论旷日持久，一则围绕“民主还是独裁”，在国难当头之际讨论如何才能实现独立富强；二则讨论因上一问题引发的文化建设路向，究竟“全盘西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大批法学家在这些讨论中发出有力的声音，如张君勱（1887-1969）、燕树棠（1891-1984）、萧公权（1897-1981）、吴经熊（1899-1986）、张佛泉（1907-1993）等等，他们从法理角度梳理这些问题，依照自己在海外求学所得及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思考，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然而这些声音竟被历史湮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鲜有人知他们的存在与贡献。他们的声名随着上世纪后半叶波折的社会进程渐次沉没。

有感于这样的图景，自2004年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主编“汉语法学文丛”，将这些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的著作重新编辑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版十余种。这些曾经声动一时、后来逐渐陌生的名字，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借用北岛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标题，他们是“归来的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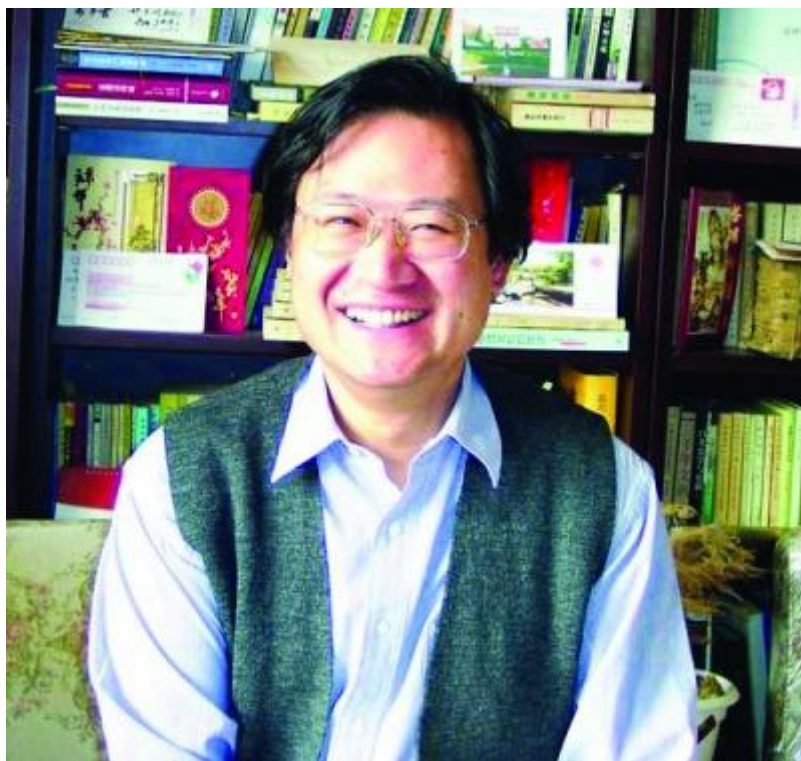
许章润在《法学家的智慧》一书中，将中国自有现代法学系统以来的法学家划分为五代。第一代在清末变法改制时期登场，如梁启超、伍廷芳、王宠惠，而上文所述诸位则基本属于第二代法学家，许称为“真正纯粹法学意义上的中国学术传统”。

他们中曾有不少当世翘楚，更在中国法学史上占据重要席位。吴经熊21岁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此后在美、法、德深造。他曾将自己在密歇根的博士论文寄给大法官霍姆斯，后者在未接到杂志只收到信件时奉劝这位年轻人“一个人在成为将军之前，先得成为士兵”，但读完论文后，马上追信称：“昨天的信多有误会，我以为我是写给一个初学者……现在我觉得我是在对一个见识渊博的学者说话，他可能哂笑我的建议。”

年轻的吴经熊与81岁的霍姆斯成为忘年交，此后他又师从德国法学家施塔姆勒学习系统法学，两位大师的理论本针锋相对，吴经熊却力图将这两派最高水平的理论融合为一体，形成了新的法律哲学。

25岁时，吴经熊回国后即出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期间还担任过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南京政府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学术、从政生涯上都可谓少年得意。然而，吴经熊却撰文自述：“身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成为一个困惑的人。”“我年近四十，却未获得我无可保留地信奉的真理，真觉得不幸之至。”

年近不惑，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法学生涯，皈依基督教，自此潜心于哲学、神学等领域的研究。这样戏剧化的一生极为典型的见出这一代法学家的尴尬与苦闷，用许章润的话说：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这些法学家、教师、法官、律师，一面陈述自己的法律价值和理想，一面眼见自己的无能与无力，“能不痛感灵魂被撕裂了吗？能不四顾茫然、忧思如焚吗？甚至于，深感无知而无趣、无力也更无意义吗？”



许章润更写道：“而且，从根本上说，这一切显现出来的西来规则及其意义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更关涉到用什么东西来‘救国救民’才最为有效的问题，一个不容回避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兹事体大啊！”

回溯中国社会二十世纪的发展，上半叶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国共在各个领域开展路线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则将此前几十年来逐渐成形的政治、文化主流一一打破，一切另起炉灶，直到文革之后再“拨乱反正”，又一次回炉再造。

萧公权、吴经熊、张佛泉等人的命运恰与此过程相始终，在年轻有为时处于国家患难，在中年要出成果时遭遇政治变革，此后或到台湾或海外潜心教书，或留在大陆于各种运动之中遭受不幸，至此沉寂。真正能将法学抱负致力于社会现实的时间，不过二十年左右。少年成名，老无所用，这是这代法学家的不幸，亦是一整代知识分子的不幸。

五代学人，薪火相传

问：你自己最早怎么接触到这些民国著作的？

许章润：真正关注民国法政学思及其作品，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以还。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中西文化讨论，无异于是对六十年前爆发的同题讨论的重温，再检讨之下，大家都似乎恍然“去古未远”，明白“中国问题”依旧，“同志仍需努力”，愈加激发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学人”追索既往的意识。毕竟，当日之“中国问题”不过是昨日“中国问题”之延续，整个“历史三峡”未过，则难题依旧，应对无当，自无解脱之望。

当其时，陆续接触到一些作品，比如，学校出售的台版法律书刊，将我们这些贫寒学子的腰包掏空，幸福而凄惶。朦胧间，知晓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法学和法学家们挥洒其间，反帝反殖之外，立宪斗争、议会民主等等政制剧目亦曾上演。——不过是昨日的事，但一层帷幔，就将心灵蒙蔽，非得钻天钻地才能看清真相，这便是二十世纪上演的中国故事，可见历史确乎是人写的。晚近中国，当政治上的四分五裂造成国族不幸的时候，可能恰恰意味着自由思想获得了自己的空间。之所以近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成果多数诞生于江山一统之前，就在于政治分裂导致管制出现了空隙，思想之树因而得以承风沐雨，在时代的激荡下茁生。因而，接续这个时代及其情思，揣摩其运思，反思其心思，光大其学思，既在承前，更在启后，舍我其谁。

因而，总括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前辈的了解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是图书馆里读“旧书”。婆娑旧籍，仿佛就与往日打个照面，而心心相应，非时间和世间所能阻隔。二是港台来的一批书籍。八十年代初，老八一中学旁边，现在的中关村科技园商务区，有一个八一书店专门卖盗版港台书，周边高校的青年声气相通，比肩光顾，心情犹如盗火。记得阅读萨孟武的《政治思想史》，明了原来还有那些人，那些事，恍若隔世。书刊行于宝岛，一水之遥，导致空间原来就是时间。第三个渠道，对于文史哲学科的学子，也许这是一条重要的通道，而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可能只有辅助性质，那就是亲炙前辈学人。

问：能谈谈对前辈学人的印象吗？

许章润：法学界的先辈，历经“反右”和“文革”，戮心戮身，所剩无几，故尔，后来人多不复见也。“不复见”似乎就等于没存在过，历史好像暂时做出的就是这样的呈示。恢复高考后入学的 77、78 和 79 级学生，所谓的“新三届”，与当时“年富力强”的老师们并无多少共同语言，这是当年的一大怪事，而且，此后可能也未必见得有多少沟通。原因无他，盖因后者大多是五十年代以后接受教育，六十年代初期以还

逐步毕业任教的，更有不少人文革前后入学、“成长于阶级斗争的火热年华，学业与扮相俱劣，做官可能混上去了，治学则多不行。”另一方面，青年学子与老人家们谈得来，有共同语言，他们是所谓“解放前过来的旧知识分子”，或者，“解放初期”出道的，一些人多少还有点旧日读书人的风范遗传。

当其时，他们多已六、七十岁，倘若现在还在世，怕已九十上下了。历经风霜，硕果仅存，老人们本身就是历史，一种不屈不挠的时代记忆，让后辈们藉由近身观瞻，而遥想当年。当时政法大学的老辈中，朱奇武、汪瑄先生均为所谓“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晚一辈的，自宁汉林先生而江平、余叔通诸先生，都还站在讲台上。爷孙辈之间的交流，经由代际互动，将晚辈的视野霎那间穿越时空，拓展到两代人以上。真真切切，至少就人文学科而言，老先生们可是大学的宝啊！

九十年代后在国外，做讨饭营生稻粮谋之外，一个重要消遣就是到中文图书馆随手翻看汉籍，摸摸中文“老书”。比如，把《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王宠惠先生的文集及其纪念文集，在大陆是看不到的，因为他曾经位居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例属“敌对势力”，好像有规定，即便在北图，也要正处级以上、单位开介绍信才能看这些人的书呢。海外的中文图书馆，凡此图书虽属冷僻之籍，可得利于“公开”，只要有心，总不至于遗漏，而在在开卷有益——顺说一句，中文著述在自己的母国难寻，不见天日，反倒需要海外寻珍，于中国读书人言，讽刺固为讽刺，而实在悲莫大焉！

问：你在著述中曾将近代中国法律学人划分为五代，刚刚讲的“爷孙之间”是第四代与第五代吗？

许章润：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之后，七十年代末期入学攻读法学院的这批人属于第五代。像蔡枢衡先生、王铁崖先生，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即已出道，“文革”之后花果飘零，可谓第三代。二者之间，还有一批人，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学成出道，介于新旧之间，比如江平先生，属于第四代。回想三十年前，青年学生主要与第三、第四两代分享共同语言。第三代学人其实所剩不多，不少力挺十载春秋以上，为后来人展示风范。

在第四代与我们之间，还有一批人，即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大学毕业的一代人，以齿德为序，固为尊长，但在学术意义上，则不成代。他们既无自己的思想贡献和理论经纬，也谈不上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存在。我在《书生事业，无限江山》一文中曾经指出，凡此中人，“非五则入于四，出四则归于五，于学术谱系言，并不构成一代。若论学术品味，多数最为不堪”。语虽刻薄，而在在据实，无庸讳言，史家当不以为河汉也。这批人现在大约七十来岁上下，最好的时光都荒废在运动中，因而，后来照样善于玩转学院政治，是运动的一把好手，绝大多数早已出局，同样是时代不幸的担受者。

与断裂的历史重新接头

问：你大概什么时候萌生了编“汉语法学文丛”的想法？

许章润：2004年出版了丛书的第一批作品，开始运作则始于此前两年。当其时，百度更张，思潮澎湃。萌发于



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期以及再度涌动国中的一些思潮，彼此抵牾，各擅其场，而尤以下述两种理论取向和思想阵营，颇具代表性。

首先，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心意赤诚，以西方启蒙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武装自己，进而观照中国当下。其以对不明所以的西方社会作为理想的乌托邦样本，要求中国的一切在与国际接轨的名目下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拢，真诚而炽烈，却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比如，法学界同人提倡法官配饰假发，这便有点不明所以了。即便在刻下西方，衙门口子也是尽量能不戴假发就不戴，只在刑事法庭或者最高法院，始将这行头高悬头颅，律师们没法子，等因奉此，同样以此行头招摇过市。原因无他，这既不卫生，又是中世纪魅力统治下的装腔作势。而现代恰恰是所谓的除魅时代，取消它们才是正道。一时取消不了，只因传统作祟，正说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急就不得，也强求不得。帮观者见贤思齐，花了眼，亦真亦幻，载清载浊。

与之相对，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力倡“王道政治”，甚至指认只有儒家教义才能救中国。这话同样真诚而炽烈，但同样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它没有对占据统治地位、滥觞于近代西北欧的现代普适性政体做出开放性回应，只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式的观点立论，说轻点，得谓一厢情愿，说重点，真所谓痴人说梦。毕竟，当今中国，若说“王道政治”，不能舍却民主政制和政治民主。民主和法治就是王道政治，或者说，是王道政治的重要载体，舍此实在别无他求。虽然未来的中国式政体的基本正当性论述中不可能排除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申说，包括王道思想和仁义精神，但是，倘若它们无法对于刻下流行于世的普世性价值做出有效回应，光是耽溺于自说自话，总非为福。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持取审慎中道的立场。他们对于中、西两方过日子的好处与难处，看来都有一些体验，也似乎均有所同情和体贴；他们对于古今之变，左看右看，好像颇能设身处地，而均有所顾应。不仅明白教条式的自由主义大哄大起无济于事，相反，却可能适得其反，而且，对于文化乡愁式的罗曼蒂克，亦多警怵。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理念和文化乡愁式的王道政治憧憬，均不过“中国问题”的因应之策，而“中国问题”千头万绪，至少以两个世纪为疗程，绝非一招一策所能打发，更非短期即可见效。

至于思想犬儒主义，自我标榜“比较务实”，貌似中道，其实不过是以对于现实的迁就和既有政治利益格局的妥协，赢得暂时的偏安，换取自家的禄寿，不足论矣。

问：这些当代的思潮如何促使你关注七八十年前的民国法学家？

许章润：凡此种种思绪，并非始自今日，亦非只是三十年间的大哄大起，实为百年思潮在新时代的轰隆回想而已。实际上，自晚清以还，历经“五四”荡涤和其后文化大讨论的洗礼，中国思想中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文化检讨愈见深入，也愈加激烈，最终演变为政治路线之争，乃至兵戎相见，你死我活。此情此景，借用黄仁宇先生“历史出现了僵局，只好用战争来打开缺口”这句话，不妨说，“理论逻辑纠结不清，遂用历史逻辑取而代之，一时间也好向现实做个交待”。其间，围绕着中西文明传承与个性的价值性分析，有关民主与法治、专制与独裁的历史性追究，打开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多维可能性窗口。其思其虑，虽时光睽违，而不失其光辉，重温包括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智慧在内的先贤虑思，看一看先辈们是如何在相近似的历史状况下做出自己的回应的，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自不待言。

其次，曾几何时，整个中国，六百余所法学院，从教师到学生，有几个人知道中国曾经有位世界级法学家，宁波吴公德生（吴经熊，字德生——编者按）先生？大家竞相标榜阅读汉译世界名著，满嘴汉译世界名著的词汇，引经据典的不是盎格鲁就是德意志。不仅举为有学有识的标志，而且等同于普世性不言自明之真理。隔绝久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趋之若鹜，正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强劲有力的吐故纳新的自强不息精神，同时，又说明不明所以，一时间阵脚乱了，丧失了文化自觉，长期以来，总不是个事。其利在

开拓视野，一下子让自己与占据主流地位的世界文化拉近了距离，同时，它遮蔽了中国问题，消泯了学人的中国问题意识，从而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可能会隔靴搔痒。凡此心态，我们固然不好说是洋奴心态，但至少表明放弃了对于自身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思想的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整理出版百多年来积攒下来最为优秀的汉语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著述，一定能打动万千学生的心，让学生在历史的维度里重新站在中国的视角思考中国问题，找寻问题的答案。

这一点已然有些效果了。几年前，我曾在课堂上做过测验，问学生，知道吴经熊的人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最近几年，零零星星有人举手了，甚至多半举手了。怎么知道的？还不就是看吴经熊的书。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它的新生代，对于自己民族的前辈居然不知道，而且并不是说古代，更非史前，仅仅是眼面前的，那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种遮蔽不是因为大浪淘沙，而是一种人为遮蔽，它所造成的认识的片面、思想的狭隘、文化视野的单薄，已然对中国近代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造成了负面影响。比如，缺乏文化自觉，缺乏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坚守，乃至于在行政决策上缺乏国家利益观念。凡此种种，过去三十多年了，难道还少吗？！

问：回溯 20 世纪的思想，你发现这些民国法学思想是真的完全被遗忘、被遮蔽的吗？



许章润：一言以蔽之，清末到民国年间的学术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学术舞台上，无存身之地。从 77 级恢复高考，到这些人的著作在 21 世纪初重新面世，中国的五六百所法学院系课堂上，现代中国法学史上的这些人，何曾有几个人的名字被年轻一代所知晓？其中可能有个例外，比如蔡枢衡先生，他不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但也是那一代人里面较为杰出的一位。他的幸运在于他是一位刑法学专家，而且直到八十年代还在世，所以侥幸为人们所知道。

其他的，只要是以思想性思考为主业，从而与意识形态沾上边的法学家，比如法哲学家吴经熊、政治哲学家张君勱，甚至较为书斋型的萧公权，因为在 1949 年后走了一条不同的人生轨迹，在政治划线方面都常常被划为另类，基本上在大陆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的视野里居然彻底消失了。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人名的发现，实际是对于这个人名背后一生思考的重新复原。对于一个人的复原，如果以点到面形成对一代人的复原，就意味着历史又重新接上了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激动人心的事情？

洋务运动是最早的开放改革

问：刚才提到的国内流行的几种思潮，你认为是怎么出现的？

许章润：凡此思潮，均为一种应激反应，不是平地起高楼式地突然萌发于今天，相反，百年中国思想史上，它们屡仆屡起，不绝如缕。“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其间的分野就已经出现。他们有共同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抱负，就是救国、建国，但是如何做，出现了思想理论上的路线之争。激进的全盘西化派很多实

际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激进派里还有一脉，就是共产主义思潮，它是彻底砸烂旧世界、全面皈依接受一声炮响送来的苏俄马克思主义，而且它诉诸于武装斗争，真正是不仅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因此这是激进派里最激进的。作为对于它们的应激反应，以梁漱溟为首，基于对于中国的情怀、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一腔惋惜（唐君毅语），起而捍卫中国文化，他们与全盘西化的自由派之间的论战丰富、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且延续了这样一脉思想。可以说包括中国法律文明在内的中国文明，经历了百年的批判，有如凤凰涅槃般的经过了洗礼，所以今天的诸多思潮你很难说是完全来自哪个西方国家的，或者说中国古代哪一脉下来的，它已经经过一百多年的碰撞、糅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在这个中间，还出现了一些调和性的思想，我们说的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包括张君勱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民盟为代表的国共之间的中间派，还有乡建运动、平民教育等一些小的运动。这些都是因应中国问题所做出的应激反应。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回头去关照，可以发现，都有一腔同情，都有一份寄托，而且都付出了一份劳动。所以中国的今天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以后七代以上的中国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有人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话是不对的，不全面。

洋务运动 1860 年开始到 1895 年的三十五年，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最早的开放改革。1905 年左右开始到 1911 年的清末变法修律，是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波浪潮。1911 年之后北洋政府很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开议会，今天我们已经见不到的情景，至少延续到 1927 年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这二十年来是第二次改革开放。有人说要到 1937 年，因为统一中国之后一方面固然加强一党专政、思想统制，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整个国家蒸蒸日上。

问：你讲现在的发展是七代人共同努力延续的结果，但这中间不是存在严重的中断吗？

许章润：严重的中断在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几脉关于解决中国问题路径的思想理论之争，演变为政治之争，又变为军事的决战。决战中胜利的一方，借助于军事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将其他几脉的思路完全屏蔽，乃至从思想史记忆中间抹去了。所以三十年间，我们注意到，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一脉，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发扬光大，成了统治全中国的思想。好在思想史的记忆，就像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一样，像民俗习惯一样，可能中断于一时，甚至可能有长达千年的中断——就像中世纪文艺复兴对于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但是作为已有的历史是无法抹杀的。一旦相同的历史境遇重新出现，基于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所激发的思想和感情，必然使人们追溯那些曾经产生过的思绪。所以中断是可能的，但彻底的消灭是徒劳的。



百年宪政，不绝如缕

问：20 世纪上半叶关于“民主与独裁”、“训政与宪政”的争论激烈，这些讨论是否能产生实际的影响？

许章润：在三四十年代，法学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年民国政府，高层里不少都有留洋背景，学的就是法学。比如王宠惠、王世杰和吴经熊。徐道邻学富五车，位居小吏，而报国服务，拳拳之心亦然。当其时，民国政体是现代中国接引西洋政体后的产物，代表了清王朝覆亡后中国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最早尝试和最高成就。其“民国”形式建立的现代国家的外貌，给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实体罩上了一个政治法律屋顶，不仅意味着政体之变，而且讲述着自朝代帝制向列国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型制的转型，而这一转型，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在民国政体之中，一般常态下，国家治理、政府建构、法治建设，乃至于一般的地方治理，都会看到民国法律人的身影。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候，法学家是不管用的，一切什么学家都不管用，罗马法谚语所谓“战争让法律归于沉寂”，剩下的唯有浩叹而已。

问：萧公权、张佛泉等人都主张“行宪不可一日缓”，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吗？

许章润：当时是有分歧的，比如钱端升等一些，认为宪法是不急之务，梁漱溟他们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中国当时战火连天，最急迫的要求的是全民动员。另一方面，也有比如萧公权、张佛泉等人，认为只有在走路当中才能学会走路，行宪不是等国民素质提高了、条件成熟了之后再说，当下行宪本身就是创造条件，而终究走向宪政之日。当时共产党也是主张立刻行宪，打倒独裁。

我觉得这几条不管怎么分歧，都是基于对中国问题的不同判断，基于对宪法、宪政作为一个政治状态和秩序结构的不同体认，也是对何为解决中国问题当下急务的工具理性选择上的认知偏差。可能在主张缓行宪的人看来，宪法是目标而不是手段，但是在当下要行宪的人看来，宪政既是目标也是手段，通过这个手段可以制约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各自都有各自的用心。

今天回过头来看，有人说中国错过了几次实行宪政的机会，比方说民国初年失去了机会，抗战结束之后新制宪会议召开失去了机会。但既然历史走到那一步，纠结和矛盾无法解决，最后只能靠战争才能打开缺口，就说明当时恐怕的确条件不具备。从帝制一统到民主宪政，用黄仁宇的话说相当于“从走兽变成飞禽”，肯定不是一日两日可以一蹴而就的，的确需要经济转型作为基础，社会支持搭建框架，民意代表这种人才的成长作为交际手段。但是另外一方面，要看到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有没有一个行动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当年建国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和宪政，具有长远眼光并且让人民看到希望的政治憧憬，这和一味强调当下不是立宪之机是不一样的，和一味强调宪政不适合中国也是不一样的。后者讲的是国情不同，不是基于对当下现实的有意模糊掩盖政治既得利益的固有结构的稳定性。

梁漱溟的一生就有变化，他年轻的时候就说赶快行宪，后来就说赶快革命，后来又是宪法是不急之务，现在的问题是救国的问题，等到七十年代中期，他就开始研究英国宪法。1974 年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英国宪法之妙，妙在以宪法限制王权。“四人帮”一倒台，他立即去找雷洁琼，谈谈中国怎么搞宪政。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的政治立场是很清楚的，换言之，新儒家作为一脉，如果不以大开大合的心态吸收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作为自己的政治理论之翼，是没有前途的。今天强调王道政治，这是小国寡民的时代，现在是天下熙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连奥地利瑞士都无法搞王道政治，更何况其他大国呢？

问：所以关于宪政的讨论是从法学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

许章润：宪政的讨论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可以说从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就开始了。1863 年丁韪良把《万国公法》翻译为中文，至少那时宪政已经成为中国高层知识分子谈论的话题。它成为第一波在中国最强悍的冲击力，是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以小搏大把俄国打败了，当时包括北京的报刊和满清朝廷议论、驻外大使发回来的电文，都在议论“日本胜在立宪，俄国败在未立宪”，吾国若想不败，赶快立宪。从满清贵

族到知识分子，都掀起一股思想热潮。第二次热潮是在第一共和奠定初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得立宪走入制度层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国鼓噪立宪，抗战时在大后方曾开展了一场关于立宪的讨论。我看到过一份梁漱溟写的材料，当年在重庆，蒋介石把梁漱溟、王世杰一帮人请去，讨论是否要立宪。后来两人同车回去，王世杰很生气地说，照你看来中国一万年都不要立宪了？梁漱溟解释，我是说战争期间不要立宪。解放以后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有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宪法文件，第一次是在帝制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时候，一是清帝逊位诏书，二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前者是把道统和政统让给你，后者是说我接过来，所以当年这两个文件应该都是立宪文件。这是一个正当性、合法性的交接，而且是和平手段，和英国光荣革命是一回事。第二次是两次新政协，一是国民党抗战以后的新政协，共产党等都有代表参加。真正具有意义的我觉得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 年宪法之前的《共同纲领》，这是具有宪法性质的，而且那时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包括在内，民主党派可以批评共产党。



问：为何近代行宪如此之难？

许章润：这是百年话题了，讲起来原因很多。比如说行宪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意味着社会中需有各自独立、又能和谐相处的利益集团，而中国当时恰恰缺乏这种利益集团。中国当时只有两种人，亿万小自耕农，及其上的少部分统治阶级。居于他们之间的只有为数很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比如说，行宪之后作为新的政治游戏，讲的是对峙的格局，而不是和合格局，对峙格局的形成要有各自的利益集团作为支撑。

西方从最早的城市自治、行业协会开端，同时有两千多年具有民主技艺的宗教传统，这些中国过去都没有，政治习惯的形成不是一时能解决的。

法学家不曾“退守”

问：如今的法律学人似乎已逐渐退居到专业位置了，不像当年张君勱他们对国家建设慷慨激昂。

许章润：就思想焦点、学术兴味而言，旧日中国的法学家约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如吴经熊、张君勱、史良和钱端升等人，怀揣天下兴亡，关注国是大端，笔涉政法经纬。如何布局国家政治，怎样达致优良政体，总体性地谋划经济和社会，战略性地梳理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他们积劳积慧的重心所在。虽书生事业，而笔力千钧，现实政治所搬演的，不过是他们的笔下风云的行动版本。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救国”和“建国”，实为清末以还一切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念兹在兹的心头大事，虽流离不敢忘怀，虽颠沛不能稍懈。正是基此情怀，吴经熊情不能已，应邀下海，其所起草的一部宪法，一如张君勱先生的宪草，都是建国大纲式的，可谓清末变法更张以还汉语宪政学思之集大成者。就著名的“吴氏宪草”来看，萦萦于四种观念，糅合了四种思想。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如仁义礼智信，一并容纳入怀，形诸文字；二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举凡公平、正义、人人平等诸项，悉在其中；三是有关建设现代优良政体的基本价值，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现实主义政治设计；四是如何在既有条件下经由分权等项安排，对于民生层面的照应。事实上，兹编宪草以“民族”、“民权”和“民生”作为纲目，顺序排列，活脱脱一个建国大纲，充盈了文化情怀，满含对于普世性价值的开放性以及关于现实政治的理性考量，非为后世浅薄之辈轻侮之“天真”。

还有一种法学从业者，多为通常所说的部门法学家，如刑法学家、民法学家、诉讼法学家、财政金融法制的专家等等，关心的多为技术性问题，做具体规范的梳理、程序的厘辨、法言法语的解析一类的工作，同样为铺设现代法权秩序所不可或缺者也。



问：怎么看待这两类法学家的关系？

许章润：今天中国同样存在着这两类法学家。以人数论，第二类法学家当然占据多数，否则，反倒不正常了。此话怎讲？因为整体而言，法学属于规范主义的技术操作型知识体系，以具体的程序安排来落实法律的价值追求，将政治理念和对于应然之境的追求消隐于实践性的规则治理。因而，梳理规范、设计程序、看着实际效果、追求“将事情办成”乃至“办好”，是法律之治的正业，也是实现规范目标的不二法门。否则，全体法律人耽溺法理玄思，忽视实际操作，则规则无腿，寸步难行，程序无着，歧路迷漫，这法制或者法治往哪里安放，自何处起步。因此，今日中国法学家们孜孜于具体的法律事业，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业道义立场，也不曾失却法学家之为“法律良心”的浩远担当。

实际上，晚近三十年里，大而言之，无论是关于人世秩序的善治、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追索、如何使得

经由法制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思考，还是人权和私产入宪、对于社会不公的持续性关注与抨击、有关分配正义的法律落实等等，小而言之，对于具体物权的现代法理定位、努力废止收容遣送恶制、协力草根维权等等，法学界和法学家们从来当仁不让，发声发力，积劳积慧。论规模论影响，其实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段。正是在此，法学家的专业理想和社会情怀获得了用武之地，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士志于道”的伟大理想精神。可能，环顾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及其从业者臻达此境。

问：经济学是这个时代的显学，它和法学是什么关系？

许章润：晚近二十年来，经济学一度唱主角，其他各门学科的发展，似乎一路跟风以经济学为标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经济发展取向，对此推波助澜。实际上，经济学问题域之宽广，所能动用的知识储备之繁复，不少为法学所不能比拟，一如法学家之建构规范世界、运筹程序规则的繁复细密，恰为其所专擅。但是，经济学的单项度和太过世俗性，特别是在当今中国情境下之难能超脱特定利益立场，其弊尽显，毋庸讳言，亦且为世所诟病。也就因此，近年来，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应因社会问题风生水起，将使得经济学和法学的主导性地位相对边缘化，也是可以预期的。

就法学界而言，现在有一批三十岁上下的学人，是正在成长中的第六代法学家，较诸老师辈们，其知识结构更为多元，其视野更为开阔，也更加关注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以及思想史的融会性创新。再给他们十年，必将集小成而臻大成。所谓时势造英雄，此时也，此势也。否则，倘若对此了无自觉，亦无自励，那么，非唯不幸，也是法学家的无能。

倘若法学家“失语”，那很“不幸”

问：与民国法学家相比，当下绝大多数法学教授退守专业领域，有对公共问题失语的趋势，其原因何在？

许章润：如前所说，多数法学家是所谓的“部门法”学者，固守专业领域，是职业所系，蔚为天职，谈不上“退守”，本来就该在那儿。但是，同样毋庸讳言的是，较诸思想性研究，凡此“专业性”作业，似乎风险较小，不存在作品刊发的阻力，使得部门法学家们不免为学科所窒碍，其问题意识与观察视角，其理论境界与价值定位，自然多所局限，因而，其作品，无论是学术性和思想性，均难以进入学术共同体话语。其之极端者，将鸡零狗碎当成玄妙学思，粗制滥造，沾沾自喜，乐不自知，也是事实。就后者言，自是“不幸”；就前者言，实属常态，就如牙科医师或者桥梁工程师的专业论文，只可能听闻于特定而狭小之专业圈内，不可能成为社会大众、新闻传媒的热门话题，也不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领域。

问：江平先生在《临江仙·悲歌》里写道：“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这句也可以用来描述法学家的境遇，为何法学家不曾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呢？

许章润：不说“退守”，也从来就不曾有过此种“退守”，而以反思法学家为何不曾发挥出应当发挥的社会影响、展现出预期中的思想力量来立论，那么，不外乎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最为浅显而切近的原因是，当今中国，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因此，应对此种情境，经济学所获得的自由空间远远大于社会学家，社会学家所获得的社会关注度远远大于法学家。君不见，当年邓公强毅力行之下，市场经济成为政治憧憬之后，经济学家才有嘓嘓乎用武之地嘛，否则，还不只是个计划图表的编制员。相比而言，当今中国，法学家们以立法、法律和司法为研究对象，所涉尽皆现实问题，关联于政治，而政治，正是政治，不是别的，老天爷，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说三道四的吗？本来，政治意味着一种

公共空间，而在当下中国，它却恰恰属于一种“私密空间”，也就因此，在下曾经指出，当下中国其实不存在政治，只有伪政治或者反政治。置此情形下，相较于法律和法学的言说可能性，法学家们所能获得的实际言说空间实在不成比例。此外，当此之世，“成功”是圣训，“成功人士”，首先是财爷和官爷，他们才是英雄。其他人等，按比例边缘化。就连小说家、文学家、诗人，除非用“下半身写作”，否则，亦且“寂寞”得很呢，“法学家”云乎哉！

第二，晚近以来，整个中国逐步从革命的时代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世俗化的常规时代。置此情形下，全民向钱看，经济学家以及冒充经济学家的各色“炒股人士”，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专家，如关注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毒品犯罪问题和非法强制拆迁问题的学者，将会获得更多关注，自在情理之中。即便如此，闪烁其间、不可忽视的一干身影，就是法学家和公益律师这样的法律从业者呢，说明法律人并不存在你所说的“退守”问题。可能，情形恰恰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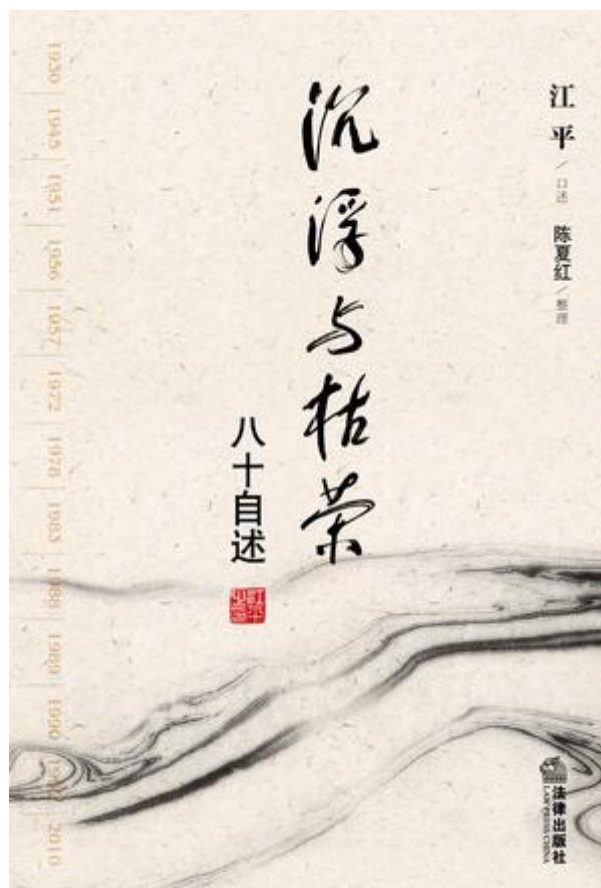
第三，当今中国历史条件下的话语权，呈现出时间和空间两重意义上的配置问题。空间意义上的配置，已如前述。就时间意义上的配置来看，刻下“中国问题”议事日程中的第一要务，好像还是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而政治转型只能是“逐步、有序”推展。法制是一个自足的自治领域，而法治就是政治，例随政治转型才能登堂入室。政治转型裹足不前，法制乃至法治敲边鼓，也能有些效应，假以时日，甚至推导、刺激政治转型的逐渐登场。但是，一日不登台，一日自然无戏可看。因此，话语权的“时间配置”意味着法治话语正在跋涉，尚未登达高峰。

第四，晚近三十年，中国的各类法学院从十来所扩展到 600 多所。抛开规模和层次上的参差不齐、甚至极相悬殊不论，就内容而言，清一色的“法学院培训”套路其实大同小异。其课程设置固守“法律专业”，其实就一点以部门法为主的条文解读和训育，外加一点程序主义的技巧性知识。凡此训育模式，使得法律从业者的知识储备、理论结构和思想言说的敏感性、感染力不足。置此情形下，无论是教师还是他们的养成品，面对纷纭世态，遭遇错综格局，只能有限恪守“职业”立场，难以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也缺乏面向全民进行大众阐释的技巧。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最有本事的人学文史哲，然后学法律经济，现在不同了，学金融，学 IT，什么赚钱学什么，真正到法学院就读的未必一定是最优秀的学生，生源质量自然会影响到未来从业者的竞争力。

问：从这几个原因说，法学家影响力的下降似乎是正常趋势，那什么意义上算作“不幸”呢？

许章润：前面对此已然有所叙及，此处还要提示的是，当今中国面临着“四大任务”，即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近代中国的法学家共同体伴随着这“四大任务”之进入历史议程而慨然登场，同样也会随着它们的递次深入而登堂入室。

“发展经济—社会”，含括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两个子项，而交缠一体，相辅相成，构成了社会文化转



型的第一要义，而着力于改善基本生存手段，转变基本生活方式。而没有良好的法律体系作为支撑，谈何转型？

建设民族国家，在于为此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法权形式，为“中国”罩上现代性政治与法权屋顶，否则，所谓的“中国”与“新中国”既无立足之地，也无自我展示的肉身。事实上，晚近历史表明，无论是追奉“大革命”理想，还是“光荣革命”式的理念，均难以避免诉诸国家形态，正说明了国家是“最终状态”与“终极边界”。换言之，无论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只有将自己体制化了，获得了存续的肉身，才能不仅成为一种伟大理念与鲜活传统，而且，也才有可能成为一种落实理念、造福人间的真正力量。同时，“建设民族国家”不仅牵涉到国家主权和政体的缔造，也牵涉到国际法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成长中的大国，此刻开始就须担负更为重要的国际责任是不可避免的。现代我们所标榜的“国际社会”，在最为理想的意义上，是各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利益自助体所构成的法律共同体，面对此情此景，中国需要成百上千明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精通国际法，同时又具有国家情怀的高端人才。放眼一望，无论是在联合国、国际法庭、世界仲裁组织，还是在联合国的各种分支机构，都没有多少中国的声音，恰恰说明中国的国际法人才的养育尚待时日。

提炼优良政体，更是典型的法学家的作业。它包括几项内容，一是如何使得共和体制坐实，二是如何使民主政制和政治民主这个已然降临中土百年的理念坐实为现实的国家体制安排。凡此一切，都需要法律和法学的实用性、操作性与规范性智慧。可能，正因为这个智慧还没有到位，这个转型也就没有完成。换言之，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智慧，形成中国社会的政治秩序，臻达政治成熟的现代国族之境，均须法学和法学家们劳心劳力，积劳积慧。现在不少人在说“中国模式”，那我们要问，中国模式究竟在现实政治意义上呈现出何种优良政体形态？好像答案并不足以服人。

重构意义秩序，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民族国家建构，抑或优良政体的选择和提炼，均无法避免价值考量，必得诉诸意义世界，由此牵扯到东西文明与宗教世界的种种纠葛，关于世俗社会与超越精神的紧张关系。因而，意义秩序的重构伴随着上述三大问题，融解于它们的解决过程之中，既在落实“人生问题”，同时也在解决“中国问题”。包括对于法律的意义世界的重构，就遇到一个“法律信仰”的问题。中国现在不仅缺乏信任，而且整个民族在信仰意义上出现了精神贫血。如果一个民族曾经只相信钱，以为致富等于全部生活，现在膜拜的是所谓的“成功”，那这个民族必定境界低下、精神萎缩，也是没有道德感召力和伦理力量的，终究无大作为。

从这四个层面来讲，倘若法学家“失语”，不仅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幸”的。

图 1 为许章润；

图 5 为 1908 年《申报》上刊登的一幅反映清末立宪的漫画，讽刺当时立宪制度与君主专制一脉相承；

图 6 为 1912 年北京法学同仁筹建的朝阳大学，为当时国内优秀法律院校，时有“北朝阳，南东吴”之说。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